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胡适研究通讯

2012年第3期（总第19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2年8月25日

目 录

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 纪念汪静之诞生一百一十周年..... 陈漱渝 (1)
- 胡适助人向上的一些故事..... 陈宏正 (9)
- 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 金 哲 (10)
- 胡适和他神龛里的三位大神..... 张启明 (26)
- 《胡适思想批判》作者群体考察和分析..... 董立功 (31)
- 胡适与陈独秀政治思想从对立到殊途同归..... 苏育生 (42)
- 敬悼周汝昌先生..... 宋广波 (48)
- 中日战争时期的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活动..... 胡慧君 (50)
- “胡适文物图片展”在北大图书馆展出..... 邹新明 (72)

他第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胡适

——纪念汪静之诞生一百一十周年

陈漱渝

1981年7月，为纪念鲁迅一百周年诞辰，鲁迅博物馆编选了一本鲁迅百年诞辰纪念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也参与了该书的选编工作。我们特约了一百多位跟鲁迅有着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作者撰文。当时年近八旬的汪静之老人也写了一篇长文：《鲁迅——莳花的园丁》。“莳花”就是栽花的意思，篇名显然受到了鲁迅早年习作《莳花杂志》的影响。

汪老在这篇文章中，回忆了鲁迅从鼓励他写恋爱诗到劝止他写恋爱诗的过程，对鲁迅表达了“沦肌浹骨”、“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文中写道：“鲁迅是一个精心的园丁”，“鲁迅是护花神一般的园丁”，“鲁迅是一个关心花的园丁”……在鲁迅诞辰百周年纪念日，汪老还写了两首七绝，总题为《护花神》，其中有“海深难比护花恩”这样的。不过如果严格依据史实，在所谓“鲁迅、周作人、胡适之这新文学界三大名人”中，汪静之第一个应该感激的人并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对于他而言，胡适才是更为重要的“护花神”。

110年前，汪静之出生在安徽省绩溪县余村，跟胡适是同乡，他的父亲汪崇发就在胡适住的上庄做买卖。此外，他们还有一些拐弯抹角的关系，主要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是汪静之原配夫人曹秋艳的小姑。不过，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汪静之一度爱上了跟他同年出生但辈分不合的曹诚英，而曹诚英后来竟成了胡适的情人。汪静之为曹诚英写了不少情诗，其中以1921年12月26日写的《我俩》提供的细节最为具体，已收入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9月出版的诗集《蕙的风》。该书1957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只节选了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并换了一个题目叫《一江泪》。

仅仅凭着小同乡的身份，早在1919年，汪静之就将诗稿寄给胡适征求意见。因为在他心目中，胡适“那个时候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学者”，而他创作新诗正是对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响应。他在致胡适信中说，我家离你家的村庄只有半里路，我父亲在你们村里开店。我就住在你们村里。因为是家乡人，所以我写的诗请你指教。

我所看到的汪静之致胡适信共十二封，最早的一封写于1922年1月13日。内容是请胡适跟汪原放沟通，催促上海亚东图书馆尽快出版《蕙的风》，并请胡

适为这部诗集写一篇序言。汪原放也是胡适的同乡，长期在亚东图书馆担任编译，因标点古典小说和出版《胡适文存》跟胡适联系甚多。汪静之在信中写道：“我的脾气，向来不喜欢靠人家介绍，我从未托人家介绍做过什么，拙诗集起先也是寄给原放先生的；现在因为种种困难，竟破例请您介绍，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汪静之当时的苦衷是什么？主要是“债鬼缠身”。当时汪静之家里每年供应他一百三、四十元学费和生活费，但上学的实际开销一年要一百七、八十元，而汪静之又喜欢买书，所以常常感到拙襟见肘。他在致胡适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困境：“我的絮被是家中的一条年纪老很了的小而破的絮被，实在没有什么暖和，近来很严寒，夜间冻得发抖抽脚筋”；“我的棉袄还是十五岁时做的，现在小而破都不在乎，只是寒冷的痛苦使我读书不安神”。为了帮助汪静之摆脱困境，胡适不但一而再再而三借钱给他（仅这封信透露，他先向胡适借了四十元，很快又想再借二十元），而且为他向亚东力争尽可能多的稿费。汪原放 1922 年 7 月 6 日致胡适信，说汪静之不愿抽版税，要一次性稿酬以应急需，汪原放斟酌后送了汪静之一百五十元稿费，问胡适这个数目是否适当。可见《蕙的风》从出版直到结算稿费，胡适一直都从中斡旋。

有趣的是，自称小学生的汪静之在已经“暴得大名”的大学者胡适面前，语态一点也不谦恭。虽然是他有求于胡适，但说话行文中常常是命令式的口吻，显得颐指气使。比如，他信中说，“我的头很硬直，不为他人而低头；我的笑很天真，不为他人而谄笑！我绝不低头！我绝不低头！！”在同年 4 月 9 日信中，汪静之对胡适采用的几乎全是责怪的口吻：“十日前给你一封快信，为什么仍旧没有答复呢？要晓得我是个没有余钱寄快信的穷鬼呵！两封快信的寄费，我可以买一本书了。《蕙的风》全集都是坏不堪言的不成其为诗，也难怪先生不屑一顾；但为甚像下了海似的音信全无呢？我们居于小学生地位的人要想出版一本诗集这点小事情竟遭了这许多波折，我实在不耐烦了，请将原稿寄回，让我把他烧个干净罢！我知道你忙的很，我也不敢用那种触目的东西来损失你宝贵的光阴。如果已替我删改好了，那是更好；如未删改，那我也等不得了，请你即刻挂号寄来，让我自己来删改一番。序，做或不做，都随便你的愿意。唉！我真想不到《蕙的风》的难产竟搁浅到这么久！大学者呵，你们太不体贴小学生的微弱无力的心了！！你们太不热心于小学生的奋勇向上的心了！！！”在这封信中，汪静之再次向胡适借三十元钱，又让胡适做他的介绍人担保人，向另一位安徽资本家汪自新筹措学费。他用长辈告诫晚辈的口吻对胡适说：“请不要把我的话当做耳边风！”重读当年这些信函，既可看出刚满二十岁的汪静之的幼稚刚直，也可看出大学者胡适的宽容大度。

尽管汪静之说，替不替他的诗集作序都随胡适的便，但胡适却在两个月内为

《蕙的风》写了一篇序言。正是汪静之的《蕙的风》和胡适的这篇序言，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

在这篇序言中，胡适将汪静之划归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二代少年诗人：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康白情和俞平伯，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汪静之这批“湖畔诗人”。在胡适的心目中，汪静之“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胡适指出了汪静之诗歌的稚气与浅露，但又认为“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浅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并进一步肯定了这种稚气中的“新鲜风味”和“浅露”下的“深入而浅出”。最受到胡适赞扬的是他“诗体的解放”。“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后来周作人在《情诗》一文中，也指出《蕙的风》发出的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然而遗憾的是，汪静之后来写给符竹因的诗多达数百首，大多是模仿白居易的“白话旧体诗”，基本谈不上诗体的大解放。

在《蕙的风》所收的72首诗作中，胡适特别肯定了其中的一首《小诗》“是很成熟的一首好诗”：

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

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

这首诗收入《蕙的风》时，诗题叫《过伊家门外》。这位“伊”就是他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绿漪，原名符竹因，杭州临平人，曹诚英杭州女师的同学，是品貌兼优的校花。因为汪静之有一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曹艳秋，所以符竹因的同学认为汪追求符的行为“不道德”，符竹因的父母也一度把汪当成“骗子”。面对旧习惯势力的压力，汪静之虽然宣言“爱情是绝对自由的，谁要爱谁，谁就爱谁”（1922年7月27日致符竹因信），但内心深处还是会感到阵阵“胆寒”。既“欣慰”而又“胆寒”，表现的正是刚被五四狂飙唤醒的新生代在传统面前的双重心态。建国后汪静之修订这首诗，在第一句的“指摘”后面添加了“非难”二字，更突出了在那个“乍暖还寒”时节他所承受的心理重压。又将第三句的“怎样”改为“多么”，使他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更为充分，也更加口语化。

《过伊家门外》一诗的诗眼在一个“瞟”字。“瞟”是出自一种既不敢正视但又偏要去看叛逆心理，而对旧道德的叛逆（即周作人所谓“旧道德上的不道

德”)才真正体现了旧社会情诗的精神。在另一首题为“伊的眼”的诗中，汪静之描写了他爱人的眼睛是“温暖的太阳”，“是解冻的剪刀”，“是快乐的钥匙”，也是“忧愁的引火线”。这首诗跟《过伊家门外》堪称《蕙的风》中的姐妹篇。

出乎胡适意料之外的是，他给予肯定的这首“很成熟的好诗”，很快便成为了文学批评界论争的焦点。大概的经过是：《蕙的风》出版后，曹诚英寄了一本给他的同乡——当时在南京东南大学就读的胡梦华。胡梦华读后，在1922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一篇批评文字《读了〈蕙的风〉以后》，指责《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疑”，“有向不道德的倾向”。胡梦华反复表白，他决不是主张强抑感情的中庸道德家，也不反对赞美自然、歌咏爱情，但“《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赞美自然之处，却流于纤巧”。在胡梦华看来，《蕙的风》跟淫曲春画一样，是在发泄作者的兽欲，挑逗读者的肉欲。这种作品代表的是堕落的文化，丑的文化：它将“破坏人性的天真，引导人走上罪恶之路”，因此“应当严格取缔”。对于为这本诗集作序的人，胡梦华也给予了攻击，说这些“滥序”有被人利用之讥，为清醒的读者笑，为昏迷的读者害。

胡梦华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首先反驳的文章是章洪熙（衣萍）的《〈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刊于同年10月30日上海《民国日报》。接着批评胡梦华的有于守璐（估计当时是济南一中教员）、周作人、曦洁（不知何许人）、鲁迅、宗白华等。胡梦华也写了一篇《悲哀的青年》答复章洪熙（见1922年11月3日上海《民国日报》）和三篇自辩——《〈读了“蕙的风”以后〉之辩护》（连载于1922年11月18日至20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对这场论争，胡梦华作了如下描述：“自从《读了〈蕙的风〉以后》发表后，胡梦华三字几成‘众矢之的’。有的从‘文学与道德’方面来攻击我，有的从‘模仿与创造’方面来责难我。”（“辩护”之三，原载1922年11月20日《时事新报·学灯》）事隔八年之后，沈从文对这场论争的评价是：“《蕙的风》所引出的骚扰，由年青人看来，是较之陈独秀对政治上的论文还大的。”（《论汪静之的〈蕙的风〉》，原载南京《文学月报》第1卷第44号，1930年12月出版）

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当年创作《蕙的风》的汪静之固然充满稚气，攻击《蕙的风》的胡梦华也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同样幼稚。他后来承认自己是“戴着假道学的眼镜，以讨好新女性的喜悦”。1929年以后，胡梦华步入政界，参加过CC派特务组织，但1948年以后被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反，在天津解放过程中做出了贡献，晚年以“爱国人士”定性。

从现存汪静之跟胡适的通信来看，在《蕙的风》出版之后，他们仍然频繁交往，这种关系至少维持到了1929年。继前文引用的汪静之致胡适的两封信之后，本文再介绍汪静之致胡适的另外十封信，和一个附件（汪静之致三叔信），以为

佐证。

(1) 1922年5月某日。

汪静之将湖畔诗社出版的《湖畔》诗集寄赠胡适，请予批评。信中要求胡适对胡思永加强教育，使其不致因“不良的胡闹”而堕落。胡思永是胡适三哥的儿子，因追求符竹因要跟汪静之拼命。符竹因担心汪静之被杀，一度想出家为尼。胡思永原有肺病，再加上单相思，不久竟抑郁而死。我不了解胡适对这两位情敌感情纠葛的态度，只读过1923年4月22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49期发表的《胡思永的遗诗》。胡适在跋语中说：“我的侄儿思永不幸于4月13日早晨死了。他死时只有21岁。他是一个有文学天才的少年，死后只剩许多写给朋友的信，和几十首新诗。他的诗大多可诵，有一些竟可说是近日新诗中的上品。他的朋友和我都想把他的诗付印，现在先抄几首在这里。”胡适的以上评价可以说明，胡思永还不是一个专门胡闹的不良少年。胡思永有些遗诗中的抒情对象是符竹因，兹录出两首为例。

寄君以花瓣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付在上面寄给你了。
你见到花瓣便如见我心，
你有自由可以裂碎他，
你有自由可以弃掉他，
你也有自由可以珍藏他：
你愿意怎样，你就怎样罢。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付在上面寄给你了。

1922.8.15

月色迷朦的夜里

在夜色迷朦的夜里，
我悄悄地走到郊外去，
找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把我的爱情埋了。

我在那上面做了一个记号，
不使任何人知道他。
我又悄悄地跑回家，
从此我的生命便不同了。

我很想把他忘了，
只是再也忘却不去！
每当夜色迷朦的夜里，
我总在那里踟蹰着。

1922.5.28

(2) 1922年11月19日信

由于《蕙的风》出版后引发了争议，汪静之在致胡适信中忏悔他出版了这部“未成熟的诗集”。面对胡梦华的攻击，汪静之表示他并不在意。他的态度是：“誉我的是引我的线，毁我的是策我的鞭，都是益我的，促我进步的，我一样感谢他们。”但他又坦陈，当读到胡梦华的批评时，他曾有点疑惑自己，后来读了周作人的文章，才敢“重新肯定自己走的是极正当的路，毫无非人性的堕落的倾向”。信中又请胡适帮他申请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赴日生员满额，则请再帮他联系留学法国。信中提到胡适此前已通过亚东图书馆汇给他三十元，但还想再借五十元。

(3) 1923年端午节前二日

当时胡适到杭州疗养，汪静之为他写了一首游戏之作：“先生心醉西湖美，脚气心愁销尽否？北地黄沙味若何，和西湖水两相比。”信中又托胡适为他谋职。此前胡适介绍汪静之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未果。

(4) 无年月日

此信提及“今年死别两个朋友”，其中包括胡思永，应写于1923年。汪静之在信中谈到他正在创作两部叙事诗：一部叫《佛的恋爱》，另一部叫《孔子与西施》（有千余行），“怀胎已满期，不久可出世”。他自认为将是“中国空前的长篇叙事诗”，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爱子”。但不知何故，汪静之寄予厚望的这两部长诗后来并未发表。当时汪静之既无钱，“又有鼻病”，因此再向胡适借数十元，以济“紧急的正用”。

(5) 无年月日

因信中提及请胡适联系《支那二月》文艺季刊的出版问题，估计写于1924年夏秋之际。1923年8月28日，汪静之跟家里包办的未婚妻曹秋艳解除婚约，于1924年4月4日与符竹因结婚。但汪父经商破产，“家中日穷一日，甚至无以为炊”；符竹因家中“亦极贫穷”。他们既无法读书，又因资历浅而到处找不到工作，于是函托胡适为他谋职：或教员，或编辑。如无事可做，就让胡适给他寄车费到北京大学旁听半年国学，并想到胡适北京寓所或《努力》周报社借住。汪静之向胡适求援时写道：“先生呵，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求你从速为我设法！”“只有你能救我”一句，表现了胡适在汪静之当时心中的显赫地位。

(6) 无年月日

因信中提及给中学生讲文学史，应写于1924年在武昌旅鄂湖南中学任教期间。信中要借胡适的《国语文学小史》做他的讲义。

(7) 无年月日

应与1924年。信中提及他使用胡适的《国语文学小史》做讲义，“学生们都很欢迎”。

(8) 无年月日

应写于1924年秋。此事汪静之失业回到杭州，想编一本初中国文教科书，同时标点李白、杜甫诗集，请胡适指教、删定。

(9) 1925年2月10日

汪静之标点完李白、杜甫诗集，又写了一篇论文《李太白及其诗》，请胡适撰写序言；又说他“现在很拮据”，请胡适“介绍一职业以免饿死”。

(10) 1929年10月9日

当时汪静之在位于上海江湾路的建筑大学任中文系教授。此前胡适曾介绍汪静之到金华一所学校教高中，后因铁民和翟俊千两位朋友坚邀，汪静之失信于金华，特写信跟胡适解释，表达歉意。

附件：无年月日

这是汪静之致三叔函，但保存在胡适处。他三叔之子汪涛在重庆干部训练团一团任职，涉嫌参与“阴谋暴动暗杀教务长”案件被捕，汪静之到重庆斡旋未果，写信建议三叔请胡适“电最高当局”营救。估计他三叔将此信转交给了胡适。

仅通过以上这些保存不完整的信函，可以充分证明汪静之跟胡适的关系远比跟鲁迅亲近；胡适对汪静之事无巨细的帮助，也远胜于鲁迅对他的帮助。那么为

什么直到晚年汪静之都没有写出一篇类似于《鲁迅—莛花的园丁》的回忆录来怀念胡适呢？这主要是汪静之在“湖畔诗友”的影响下不断追求进步，创作了《天亮之前》这种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抒情诗，而胡适却由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人逐渐进入了蒋介石政权的政治中心。《汪静之自述生平》中写道：“胡适之是最早反对共产主义的，因此后来共产党这一派就骂胡适之。我看了骂胡适之的文章，认为对，觉得这个有理，因此我也瞧不起胡适之了，我后来就不高兴再和他通信，虽然他是我的恩师，又是家乡的小同乡。”（《汪静之先生纪念集》，第2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直至1994年8月1日，汪静之在《六美缘》一书的自序中，还称胡适是“五四时代的右派名家”，“资产阶级的圣人”。不过，后来的“瞧不起”归“瞧不起”，他跟胡适曾经有过的交往毕竟成了无法抹去的历史。

同样是出于政治上的顾忌，汪静之在《鲁迅—莛花的园丁》一文中，对他跟周作人的关系也有所隐讳。这篇回忆录说，他“在读了鲁迅的新诗《爱之神》之后，就给鲁迅写信，附了学写的新诗请他指教。查1921年6月13日的《鲁迅日记》就有：“上午寄汪静之信”。这都是鲁迅寄回诗稿的回信”。今天重读，发现这段文字有移花接木之嫌。查鲁迅日记，此前绝无汪静之来信的记载，而依据鲁迅日记的体例，应该是先前“得某某某信”，才会有后来的“寄某某某信”。参阅同一时期的鲁迅书信，汪静之第二个求教之人并非鲁迅，而是周作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汪静之说，“五四运动初期，鲁迅没有周作人名气大。”直到1986至1993年汪静之向女儿汪晴口述家史时，才坦陈他“第一个崇拜胡适之，第二个崇拜周作人，第三个才崇拜鲁迅”。（《汪静之自述生平》，《汪静之先生纪念集》第259页）不巧的是，1921年6月2日至9月21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到京郊香山碧云寺养病，所以汪静之寄周作人的信件才由鲁迅代复。鲁迅1921年7月13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我想汪公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直到同年9月8日，周作人才亲自回复汪静之同月3日的来信。所以，汪静之如果活到今天，重写回忆文章《莛花的园丁》，他第一个应该提及的会是对他帮助最大的胡适，第二个提及的会是最喜欢他诗作的周作人，第三个提及的才会轮到鲁迅。这才是历史的“本真”。

（作者单位：鲁迅纪念馆）

胡适助人向上的一些故事

陈宏正

中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胡适生平最爱帮助年青人，最会鼓舞年青人。下面是一些令人感动的故事。

(一) 1957 年台大历史系许倬云刚由台大毕业，想去美国留学深造。经由胡适的奔走，最后找到台湾徐氏基金会，补助美金一千五百元，帮助许倬云赴美留学，后来许倬云成为世界中国上古史闻名世界的学者。

(二) 彭明敏 50 年代台大政治系毕业，由台湾政府奖学金资助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深造，念研究所才念完一年，台湾奖学金无法继续，胡适知道此事，他私人送相当数额的美金让彭明敏在 1953 年完成麦基尔大学的研究所学业，此事彭明敏一直不知道是胡适私人帮助，直到胡适一九六二年过世，才由台大校长亲口告诉彭明敏，帮助他完成麦基尔大学学业的是胡适。(见彭明敏著：《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基金会出版)

(三) 著名作家林语堂在年青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公费突然停止，极需援助。胡适以北京大学名义汇来一千美金使他能够继续读书。直到后来林语堂才发现那是胡适自掏腰包汇钱助他完成学业。(见林太乙著：《林语堂传》，页 310)

(四) 名作家陈之藩五十年代拟赴美留学，胡先生帮助他留学美国约三千美金。胡先生给陈之藩的信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留在人间。”这是何等伟大的心胸？看到别人的成功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别人的失败，他就援助不遑。(见陈之藩著：《在春风里》，天下文化出版；又《陈之藩文集》二)

(五) 台湾名作家李敖也得到过胡适的大力资助。胡先生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听说李敖经济困难，他马上送他新台币一千元，表示关心(当时胡先生中央研究院薪水是月薪新台币二千元)。五十年后李敖去北大访问，他说愿以一千三百倍的钱即新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兴建一座胡适铜像——坐落在北大校园里，以报答胡适的恩情，但可惜好像北大没有动作，建胡适铜像也没有消息。

胡先生一生崇拜自由博爱。他最喜提拔后进，被其鼓励帮助者不止上述五位名人。在世界上应该还有很多人受他的帮助鼓舞。只是胡先生帮助人都是暗中，不让人知。胡先生儿媳曾淑昭女士说胡先生本身没有钱，但慷慨解囊，帮助他人是他最大的乐趣。

胡先生逝世五十年，我们今天还很想念他那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

陈宏正

2012、7、19 于感动中写于台北

(陈宏正：热心支持胡适研究的台湾朋友)

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现代朝鲜文坛

金 哲

胡适（1891--1962）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和哲学家。20 世纪 20 年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在邻国朝鲜，胡适都享有盛名。可以说，胡适是继近代梁启超之后对朝鲜文坛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胡适对朝鲜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领域影响深远。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朝鲜文坛正处于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期，此时期正需要外部优秀文化及文学的养分。虽然当时通过日本各种西方文化不断地涌进朝鲜，但真正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并不多。在各种外来思潮相互搅乱的情况下，在探索朝鲜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少朝鲜爱国知识分子和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邻国——中国文坛，关注中国化的西方文学¹。他们试图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寻求适合本国文化文学的发展之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学习和接受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胡适和他的先进文化思想被译介到朝鲜，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作为接受者，朝鲜文坛以及朝鲜的知识分子被胡适深深地吸引。同时，胡适本身也对处于殖民地的朝鲜文坛及朝鲜人民有一定的关注，双方逐步建立起了友好关系。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些现象对现代朝鲜文坛产生怎样影响？这些都是值得深思、探讨的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界在胡适与朝鲜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²但也存在史料发掘不够彻底、全面，对有些资料的解释和运用不太准确等问题。本文以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至 40 年代这一时期为中心，将重新考察胡适与朝鲜文坛及朝鲜文人间的交流情况以及朝鲜文坛对胡适及其文学的接受和评价情况，进一步阐述朝鲜文坛与胡适的关系及其在文学交流史上的意义。相信本研究对今后中朝现代文学交流史研究和中朝比较文学研究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适与朝鲜文人的交往

胡适与朝鲜文人的直接交流并不少。交流时期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到 30 年代。其实，胡适与朝鲜人的缘分始于在美国的留学时期。1916 年，胡适在

¹【韩】李锡浩：《胡适的文学革命影响与其接受情况》，载《中国文学》第 2 辑，1974 年，第 1 页。在本论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化”西欧文学是指通过中国引进的西方文学。这个概念是韩国学界通常谈论的，与通过日本接受的西方文学相对而言的概念。

² 胡适与朝鲜关联研究情况，国内研究：尹允镇：《胡适在朝鲜》，《鲁迅研究月刊》第 3 期[[J]，2008 年。国外（韩国）研究：李锡浩：《胡适的文学革命影响与其接受情况》，载《中国文学》第 2 辑，1974 年；李廷吉：《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与实践》（博士论文），忠南大学，2003 年；崔成卿：《关于胡适新诗的研究》（博士论文），岭南大学，1996 年；权基永：《关于胡适白话文论的研究》（硕士论文），延世大学，1996 年；徐琨：《崔南善与胡适新诗开拓比较研究》（硕士论文），首尔大学，2012 年等，有十多篇相关论文。但没有一篇胡适与韩国有关系的论文。

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结交了一位叫金铉九的朝鲜人，胡适非常敬佩金铉九的自强不息、刻苦学习的精神，而且对亡国朝鲜友人的境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他经常为无力帮助朝鲜友人而感到遗憾，曾自责道：“韩人对于吾国期望甚切，今我自顾且不暇，负韩人矣。”¹看来胡适似乎已经对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和朝鲜人有了不少的了解。

朝鲜现代《开辟》杂志社与胡适之间的因缘是由梁白华（1889—1944）促成的。梁白华是朝鲜近现代小说家、翻译家，也是一位笃实的佛教徒。原名梁建植，“白华”是他的号²。虽然梁白华没有见过胡适，但通过日本（…）对胡适有较深的了解。《开辟》于1920年6月25日创刊，它是以朝鲜“天道教”³为背景的杂志，也是朝鲜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综合性杂志之一。1919年的“三一”运动之后，朝鲜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朝鲜，在文化政策上，从强硬的武断统治转为“柔韧”的宽容政策，允许朝鲜人在限定的范围内办几家报刊，并可以发表各自言论。包括《开辟》在内的不少朝鲜报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开辟》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它担负起了朝鲜新文化运动的重任，始终站在朝鲜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并且鼓吹反日思想和社会平等，起到了中枢作用。在日帝无数次的高压政策下，《开辟》无奈于1926年8月1日（总发行72号）停刊。⁴梁白华曾在此杂志上作文介绍胡适的思想和文学活动。

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编写的《胡适年谱》里有这样的记录：“1月17日，朝鲜青年梁建植致信，表示仰慕。希望能撰文并赐照片给朝鲜一家杂志《开辟》登载。”⁵这证明胡适和梁白华曾有过书信联系。这里所提到的“梁建植”（或“梁氏”）就是当时朝鲜的中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梁白华。梁白华受《开辟》杂志社的委托，给中国胡适送来信函，请求胡适为《开辟》杂志写个题词。胡适收到这份邀请后，给《开辟》杂志写了“祝《开辟》的发展”（题词时间：1920年12月19日）的题词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⁶这时候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朋友高一

¹胡适著：《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卷），台北·商务印书出版社，1959年版，第582页。“韩人金铉九之苦学（三月七日），吾友韩人金铉九君自西美来此，力作自给，卒不能撑持，遂决计暂时辍学，他往工作，俟有所积蓄，然后重理学业，今夜来告别，执手黯然。韩人对吾国期望甚切，今我自顾且不暇，负韩人矣。”记录时间为1916年3月7日。台湾大学图书馆藏书。

²梁白华有号“白华”之外，还有“菊如”、“芦下散人”、“芦下生”、“今来”、“城西闲人”、“天爱”或“天爱者”或“天爱生”等许多号。

³朝鲜近代宗教领袖崔济愚（1824—1864）所创建的“东学”，由第3代教主孙秉熙（1862—1922，独立运动家、天道教领导人）改名为“天道教”。它的“神”就是“天”，是以“人乃天”和“事人如天”思想为基础的宗教。

⁴《开辟》杂志于1920年6月创办，到1926年停刊。8年之后，由车相瓚于1934年11月重新开办，1935年3月再次停刊，1946年1月又办续刊，到了1949年完全停刊。历经沧桑，走过了30年。

⁵耿云志著：《胡适年谱》（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⁶胡适信函（复函）内容全文：“敬启者适披阅贵志，方知贵志为东方文学界之明星，兹收数字奉呈，以为贵志之祝笔，代登为感。专此敬谨贵社日益发展。同呈敝同事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君祝词，并乞收纳。胡适谨启，九·一二·一九。”

涵也赠送一份“《开辟》：威权之敌”（题词时间：1920年12月20日）的题词¹，同时还有上海“兴华报”社也送了《开辟报新年祝词》。²《开辟》杂志便于1921年1月1日新年号上刊登了这些题词和信。胡适对此感到很高兴，曾在写给青木正儿信中也提过此事。³而且梁白华也为表达感谢，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笔者最近在阅读有关胡适书信的资料时，恰好发现了梁白华致胡适的此封信件。写信的时间是1921年1月17日，这正与“胡适年谱”所提到的“1月17日，朝鲜青年梁建植致信”之内容相符。当然，这里胡适所说的“1月17日”是指梁白华写信的时间。从内容上看，此信件主要内容是梁白华对新年之前胡适和高一涵两位教授为《开辟》新年号写个祝辞（题词）之事表示感谢的信件。信中还以“阁下为东洋举炬火于文坛之伟业”、“中国文坛之权威”等词来高度评价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业绩，以此表示对胡适先生的敬佩，同时表述了要翻译日本青木正儿有关胡适的论文的想法。⁴

总之，胡适的这幅题词和信件对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知识分子及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也具有超出单纯意义上题词的文化意义。梁白华和胡适之间的这种交流为中朝现代文坛文人的交流开了先河，这对胡适个人而言意义颇大，在中国现代文坛与朝鲜现代文坛上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文化交流。

之后，胡适与朝鲜文人一直保持着交流。1923年5月，亡命在北京的朝鲜独立运动家李民昌⁵也曾经给胡适写信，赞扬胡适对朝鲜青年的积极影响，并请求胡适先生在《开辟》杂志创办4周年之际，为朝鲜(韩国)青年们写一篇鼓励的文章。信中有这样的记录：

“胡先生 台鉴：我有一件请您恳求的事情，可以允许么？我办弊国出版的《开辟》杂志特约的事务（已赠呈一两号您记住罢！）。今年正月自本社来信乞您的文章，其时您在西湖养病，所以不能请您了。现在中国一般的事情与您倡导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事已经屡次在该志上介绍。弊国多数青年格外欢迎您的思想与文章，您的人格已经深深广印在弊国青年的脑

¹ 这里“威权”正是与胡适于1919年6月11日创作的诗名称相同。这首诗与陈独秀于1919年6月11日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事件有关系的。“五四”运动前后，与胡适一起在新文化战线上并肩作战的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结果被北洋政府密探逮捕。得知这一消息后，胡适当晚写了《威权》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胡适在诗中强烈抨击了专制统治。胡适之友高一涵恰恰以胡适的诗名《威权》作为题词送给《开辟》，以此表示了对朝鲜新文化运动的期望和鼓舞。这绝不是偶然的事。参见阿炳编著《国学宗师—胡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² 【韩】参见1921年1月《开辟》新年号，第1页。

³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致青木正儿》。“青木先生：谢谢你十二月七日的信（实际上十七日，误写）……《支那学》将变成一个‘打破国境’的杂志，这是我们极欢迎的消息！（前见韩国青年出的《开辟》杂志，中有《胡适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一文，是你的原著：这也是打破国境的一种现象。）我病后若有新著作，一定寄些给《支那学》发表。匆匆先感谢您的厚意，即贺新年。胡适 九、十二、廿四。”

⁴ 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卷（影印本），黄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601—605页。

⁵ 据史料李民昌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家，李民昌与著名独立运动家安昌浩、吕运亨一起活动。参见《國民代表會ノ經過ニ關スル件》[高警 第598号；1923.2.27]（《日本外交史料館資料》）。

底，所以很盼望您对韩国新工作的意见。……”

可见，李民昌为得到胡适的文章和高见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同时发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已经成为当时朝鲜青年知识分子的偶像。

20世纪30年代初，朝鲜近现代著名禅宗史专家金九经（1899—1950）也曾与胡适有过一段往来。金九经，字明常，号鸡林，主要从事佛教研究。金氏1921年赴日留学，在大谷大学文学部学习期间，师从当时日本禅学的代表人物铃木大拙，专攻包括禅宗的佛教学。1926年回国，1929年得到中国朋友魏建功¹的帮助，携家属到北京，临时住在未名社，此时也刚刚结识了鲁迅。金九经大约于1929年5月至1932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任教。《北京大学校史》中也记录着1931年金九经在北大任教情况。当时，他在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日语组），主要负责教《中日朝字音沿革比较研究》、日语会话及作文。²与胡适交往的时间，也正是这个时期。

在中国，金九经能够在学术上得到发展，靠的是他自己的佛教学功底。禅宗史学者金九经于1930年开始参与中国敦煌石窟文献的校对和出版工作，并为中国敦煌石窟文献整理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九经的指导教师铃木大拙是日本现代著名的禅学思想家，是一位以向西方介绍禅学而著称的世界文化名人。³铃木大拙和胡适是于1933年（昭和8年）10月在日本相见的。⁴

胡适对佛教也有一定的兴趣和研究。1926年到欧洲考察时，他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发现了大量的初期禅宗史文献，其中有《楞伽师资记》。当时拿到这本副本的胡适，一直没有功夫去专门校对和研究。恰逢此时，因偶然的来华（北京）的朝鲜学者金九经了解到此情况，便告知导师——禅学者铃木大拙。之后，受铃木先生的委托，从胡适手中借来《楞伽师资记》手抄，对伦敦本与巴黎本进行对照研究。⁵在胡适和铃木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金九经

¹ 魏建功（1901—1980），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教授。魏建功字天行，笔名建功、康龙、山鬼、文狸等。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曾在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任教过。

²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287页。

³ 铃木大拙（1870—1966）日本佛教学者。原名贞太郎，后因学禅，改名大拙。别号也是风流居士，石川县金泽市人。

⁴ 胡适于1933年8月由美国赴加拿大，在班府（Banff）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第五届常会（14—18日），并到瓦沙大学演讲。10月份回国时到日本横滨。当时铃木大拙在横滨港亲自接胡适，且两人会谈。1934年5月铃木大拙访问中国，与胡适见面。参见《胡适年谱》（耿云志著），中华书局（香港）1986年版，第136页。

⁵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1907—1933）》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页，《复金九经》。“九经先生：铃木先生的楞伽研究，已读了一部分。他的工作是很可佩服的。有一部分的见解，他和我很相同。但是有些地方，我不能完全同意。他似乎过信禅宗的旧史，故终不能了解楞伽后来的历史……但他不曾见敦煌石室保存到《楞伽师资记》，净觉撰，有巴黎本及伦敦本，我皆有影本……我本想作《楞伽宗考》，至今未成；俟定居后，当续成此书，请铃木先生指正……。胡适 二十年一月二日”

于1932年3月校对完毕，并把其校订版在北京出版。金九经特别邀请胡适为“校订版”写序，¹胡适欣然接受邀请。在《楞伽师资记序》中，胡适特意向金九经表示感谢。之后，在此基础上，铃木大拙于1932年出版《楞伽经研究》。他的研究也参考了金九经解释的《校刊唐写本楞伽师资记》（1933年9月在沈阳出版）。

2

另外，20世纪30年代初，朝鲜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丁来东也曾见过胡适。丁来东在北京留学生活近九年（1924年8月—1932年5月），这期间专门学习中国文学。他在自己的中国回忆文章——《中国文人印象记》中说过：“笔者找胡适，到他住所拜访是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遇难数日之后的事。”³徐志摩空难时间是1931年11月19日。那么，可以推断，丁来东访问胡适的时间是在他回国之前，也就是从1931年11月末至12月初之间。

丁来东把当时的访问情形，较详细地记录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国文人印象记》（以下《访问记》）中。他这样记录对胡适的印象：“胡氏虽然身材矮小，但恰似用石头灌成似的显得非常健康，眼睛虽然近视，但还是十分玲珑。人们常说：才智在于双眼。胡氏双眼也显得很有灵气。他善于交际，说话声音也很清楚，而且每一句都很有力度，显得非常果断。不讲无用之谈……性格爽快，充满生机。”从这里可以看出，丁来东对胡适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的心情肯定是万分激动，因为他面对的矮个先生，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丁来东回忆，在自己的印象之中，胡适是位地道的学者。《访问记》中，两人谈的内容记录并不多，但两人交谈得非常投入。当时，胡适向丁来东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朝鲜语的发音和朝鲜语汉字词的发音以及朝鲜新文学的情况。对此，丁来东也一一回答并告诉胡适，自己前些年在《朝鲜日报》上翻译介绍了他的文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⁴，胡适听后非常高兴。看来，当时交谈的气氛非常融洽，话题也较多种多样。虽然是非常短暂的会面，但两人的会面在中朝现代文人交流史上是值得记忆的佳话。

总之，胡适与朝鲜及朝鲜人的交往并不多，对朝鲜的了解也较少，通过他对

¹胡适：《楞伽师资记序》，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发行1935年版，第239页。“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九月八日，我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读了敦煌写本《楞伽师资记》，当时我就承认这是一篇重要的史料。不久我回到伦敦，又在大英博物院读了一种别本。这两种本子，我都托人影印带回来了。五年以来，我时时想整理这书付印，始终不曾如愿。今年朝鲜金九经先生借了我的巴黎伦敦两种写本，校写为定本，用活字印行。印成之后，金先生请我校勘了一遍，他又要我写一篇序。我感谢金先生能做我所久想做的工作，就不敢辞谢他作序的请求了。……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五夜。”

²【韩】金时俊：《鲁迅所见面的韩国人》，载1997年《中国现代文学》第13号，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³【韩】丁来东：《丁来东全集》（2），金刚出版社1971年版，第135页。《中国文人印象记》由“才气和精力横溢的文人学者胡适氏”、“精密坚韧谦让并始终如一的周作人氏”、“谐谑滑稽的主将谈论风发的刘复氏”、“新文坛最初的女诗人男子气质的冰心女士”、“精通新旧东西文学的文坛幸运儿郑振铎氏”等五个部分组成。

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是胡适在1930年为《胡适文选》写的自序。此《文选》是胡适先生从自己的三集《胡适文存》中精心挑选22篇文章而编著的。

邻国朝鲜和朝鲜人的关注，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善和真诚的感情。

二、朝鲜文坛对胡适的接受及评价

20世纪20年代初期，朝鲜文坛正处于文学转型期，需要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文化文学的养分。朝鲜文坛开始关注邻国中国的现代文学发展，并通过译介和评论方式引进了不少中国的新文学。第一次把胡适介绍给朝鲜文人的，是翻译家梁白华。1920年11月开始，梁白华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¹的文章译成朝鲜语，发表在《开辟》（第5—8号）杂志上，题为《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²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称赞其为“这也是打破国境的一种现象。”在文章中，梁白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胡适，这篇文章也是朝鲜现代文坛上最早介绍中国新文学状况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诸多功绩，同时介绍了新文学运动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如提倡白话文小说和新戏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并阐明了新文学革命的主张和白话诗创作情况及其倾向。但重点还是胡适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以及《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等文章。梁白华的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朝鲜文坛和学界的广泛关注，胡适独特的新文化文学主张强烈地吸引了正处于文学转型期的朝鲜文坛和朝鲜文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胡适”这个名字传遍朝鲜文坛和学界。

朝鲜文人通过梁白华翻译、介绍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1920年）这一篇文章第一次初步了解到胡适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状况。当时这篇文章在朝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译文较详细地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³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⁴两篇文章，同时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文坛白话诗创作情况和以《新青年》为中心展开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的文章，1917年2月）的论争，并介绍了新诗和小说创作、翻译、戏剧等方面活跃的俞平伯、康白清、欧阳予倩、鲁迅、周作人等诸多作家、诗人、评论家的情况。但整篇文章还是主要介绍胡适的新文学主张和以他为中心展开的“文学革命”论争以及他的新诗创作主张。以这篇文章为契机，朝鲜文坛和朝鲜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国的胡适及他的新文化文学思想。

¹ 青木正儿，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人，汉学家。1911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时任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和《支那学》编辑。胡适和青木正儿有较深的交情，目前《胡适书信集》当中有9封寄给青木正儿的信。

² 此文章原来是1920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曾在《支那学》（又称《中国学》第1期—第3期）杂志上发表的《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浪滚的中国的文学革命》一文。梁白华早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的《开辟》（5—8号）杂志上翻译发表。

³ 胡适于1917年（民国6年）1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5号上的文章。此文章当时在中国文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⁴ 胡适于1918年4月18日，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

之后，在朝鲜文坛上陆续出现了有关胡适的文章。其中，既有胡适文章的译介，也有对胡适及其新诗的介绍。梁白华于1922年8月在《东亚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¹，次年（1923年）又翻译了一篇《谈新诗》（胡适作，1919年）²，并将此文章发表在《东明》上，译文题目为《新诗谈》。1923年4月29日，朝鲜语言学家李允宰³在《东明》杂志上，分4期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译文。⁴

1934年，梁白华专门介绍胡适的文章《胡适》，发表在《每日申报》上。⁵文章约有四千多字（朝鲜文），介绍了作家的简历及在国内外的活动情况、哲学和文学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这篇文章中，梁白华也介绍了胡适的作品《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论短篇小说》、《词选》、《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剧本《结婚》（原剧本名称为《终身大事》）以及他的外国文学译作集《短篇小说集》等。

另外，还有翻译家李像隐于1927年译介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⁶。这是一篇演讲稿，胡适通过这篇文章阐述了他对“实验主义”的理解。他把实验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这个命题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胡适也曾因此言论而受到了舆论的攻击。其实，他主张的“实验主义”是以科学与民主为内涵的实验主义，是近代西学的正统。⁷

在胡适的文章中，还有一篇备受关注的文章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⁸朝鲜的姜汉仁曾于1935年将其翻译并发表在《朝鲜日报》（学艺版）。目前，虽无法确认译者姜汉仁的真实身份，但可以断定译者是位精通英语的朝鲜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是胡适的英文著作之一。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见证人，对新文化运动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篇英文著作中，胡适在解释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时，特别喜欢以“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来形容。“文艺复兴”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都了解这个词的来历，但胡适是第一个将它与中国文化发展情况联系起来命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人，并且胡适也是第一次将“中国文艺复兴”与中国现代化运动联系在一起。1923年，胡适首次以《中

¹【韩】参见1922年8月22日—9月4日《东亚日报》。

²【韩】参见《东明》第37—40号，1923年5月13日—6月3日。原文题目为《谈新诗》，此文是胡适曾于1919年10月10日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

³李允宰（1888—1943），号桓山，又号“한뫼”（一座山的意思），朝鲜人语言学家，出生在朝鲜庆尚南道金海。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当过朝鲜语研究会（1921）和朝鲜语学会（1931）的领导人。

⁴【韩】参见1923年4月—5月《东明》（33号—36号）。这篇文章正是李允宰在北京留学生活时翻译的。

⁵【韩】参见1934年3月5日—3月6日《每日申报》。

⁶《实验主义》收录在《胡适文存》一集，第228页，于1919年写作。李像隐是于1927年7月翻译此文章后，发表在《现代评论》。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

⁷欧阳哲生：《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再读胡适》，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页。

⁸【韩】参见1935年2月2日—2月9日《朝鲜日报》。姜汉仁共分6次翻译介绍了此文章。

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为题, 讨论了中国自宋明以来文化学术的演变。之后, 他经常围绕这个题目作演讲。这不但是一个用词的问题, 有其特殊的内含和意义, 它表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有其自身的选择。总之, 胡适提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话题, 不仅对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 还是朝鲜新文化运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另外, 1923年8月起, 《东亚日报》还创办了“星期日专号”, 详细介绍了胡适的《最近50年的中国文学》(这是翻译之后的题目, 原题目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文章也是由梁白华翻译的, 1924年3月胡适¹发表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上。胡适立足于传统的史学精神立场, 回顾了自1872年至1922年, 即从古文的末路、古文学的新变到白话小说的发达及缺点, 再到文学革命——这约五十年的文学历程。这种反省和回顾, 既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 也是在有意识、有选择地建构历史, 让历史说话。鲁迅读过这部著作之后曾大为赞叹: “大稿已经读讫, 警辟之至, 大快人心! 我很希望早日成书, 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 胜于许多空理论。”²这里的“大稿”就是指胡适所写的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41年1月, 李陆史³也翻译了胡适的这篇文章, 发表在《朝光》杂志上, 题目为《中国文学50年史》。⁴但李陆史只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朝鲜现代文坛对胡适文章的关注程度。

朝鲜知识分子非常欣赏胡适和他的新文学观点, 积极接受胡适的影响, 并从中深受有益的启发。《开辟》杂志是在介绍中国新文学中表现最活跃、发表相关文章最多的杂志。特别是对胡适和他的文章介绍最多。北谷东旅于1922年在《开辟》发表的《从中国的旧思想旧文艺的改革谈新东洋文学的树立——他山之石、谈当代中国的新文学建设运动》⁵一文中, 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情况时, 详细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章立足于建立新东洋文化的角度, 主要探讨了七个方面的问题: 1) 曾国藩的上海机械厂建设; 2)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 3) 梁启超的新学会宣言; 4) 以蔡元培为中心的北京大学新教育; 5)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6)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 7) 王世栋的新文学评论。最后, 它高度评价了胡适、陈独秀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的新文化思想。

评论家朴鲁哲在《朝鲜日报》上发表的《中国新文学简考》(1—3)⁶中,

¹此文的原题目是《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922年3月完稿, 次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原版是由新民国书局发行, 1929年1月出版。

²《致胡适》(1922. 8. 21)。参考《鲁迅全集》第1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431页。

³李陆史, 1904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安东郡陶山面远村洞。其原名是源绿, 后曾用名源三及活, 字台乡, 号陆史, 1937年1月在北京去世。

⁴【韩】参见1941年1月1日—4月1日《文章》(第22号, 第25号)。

⁵【韩】参见1922年12月1日《开辟》第12号。

⁶【韩】参见1928年11月25日《朝鲜日报》。

对胡适与他的文学观进行了评价，他主要是从历史进化论的脉络谈论学者胡适的文学观。另外，评论家李殷相也在1929年1月1日的《朝鲜日报》上发表介绍文章《中国文学泛论》，对胡适的新文学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朝鲜翻译家裴滢也曾在《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化》¹一文中，对胡适的“文学革命”的最高命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了较高的评价。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包括《开辟》在内的许多很有社会影响力的报社纷纷请求胡适为自己报社写文章。其中《朝鲜日报》社特意邀请胡适先生为该报写一篇文章，于是1925年1月1日，胡适应邀为《朝鲜日报》特别撰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界》，此文专门介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梁漱溟、吴敬恒、张君勱等学者围绕“科学与人生观”而展开的一场论争。当时报社把这一篇文章翻译成朝鲜语发表在本报上。该报称胡适为“思想界之泰斗，青年界之头领”。²

朝鲜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丁来东在《朝鲜日报》（1929年）上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国现文坛概观》。在文章中，丁来东比较客观地评价胡适的“文学革命”，充分肯定胡适等领导的“新文学运动”，尤其对“言文一致”的主张特别表示赞赏。丁来东非常欣赏胡适。他译介了胡适的不少文章，以此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甚至到了60年代，还对胡适念念不忘，发表《中国新诗的变迁》³一文表示对他的尊敬。在这篇文章中，丁来东高度赞扬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他为中国新诗运动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1931年，柳根昌在《新生》杂志10月号载文《扭转新中国命运的人物》，仍将具有“英国人的沉着，美国人的创意，德国人的探究心”的胡适，视为中国学界的代表。

除此之外，李庆孙、李明善、尹永春等文人的文章中也有部分介绍和评论，但他们的介绍和评论与上述文人的文章内容相差无几，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另外，《朝鲜文坛》、《现代评论》、《朝光》、《朝鲜之光》、《东光》、《新兴》、《新东亚》、《文章》等诸多朝鲜刊物上，都或多或少地介绍了胡适以及他的文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一生中写了不少的白话诗。他的新诗作品大多都收录在《尝试集》中。⁴朝鲜文坛还特意关注、介绍了不少胡适的新诗（白话诗），其中也有翻译的译诗，也有没有翻译的原文诗。最早被译介的诗是《他》和《江上》以及《一念有存》（原诗名《一念》）。这3首诗均收录在1920年梁

¹【韩】参见1941年《春秋》7月号。

²译文载《胡适研究丛刊》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在第352页再引用。参见1925年1月1日《朝鲜日报》。此文章标题前面有胡适之题词：《敬祝新朝鲜的进步》字样。

³参见1964年7月《杏苑》第3号。

⁴《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蕴涵丰富，有胡适留美期间与友人的热情且无间的游戏赠答，有恋爱中青年男女的甜蜜与哀愁，有对家中亲友的眷眷思念，有对个性解放的深深的渴望，有寂寥时淡淡的哲性沉思，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等。梁白华曾在致胡适的信中也提过《尝试集》。

白华翻译发表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中。其中，《他》和《江上》两首诗是胡适的早期白话诗，属于所谓尝试诗。《一念有存》是较有成就的白话诗作品。这3首诗均没有被翻译，只是引用原文而已。这可以算是胡适的白话诗第一次与朝鲜读者见面。之后，1923年，《东明》上刊登了胡适的《上山》（1月号）、《我的儿子》（5月号）等翻译作品。还有，梁白华发表于1923年5月13日—6月3日《东明》上的《新诗谈》（原名《谈新诗》），也有胡适的《应该》、《鸽子》、《一颗星儿》、《送任叔永回四川》、《老鸦》等5首诗，均不是翻译作品，只是引用原诗而已。此外，于1927年《海外文学》创刊号上，刊登了自由诗《11月24日夜》（原诗），第二号上刊登了《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等。另外，1931年，天台山人（金台俊）在《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艺观》¹中也原文引用介绍了胡适的《蝴蝶》和《鸽子》等。

但朝鲜文坛对胡适的诗创作，评价不是很高。其理由是因为虽然胡适对白话诗的创作讲了不少，但在实际新诗创作上取得的成果并不多，水平也不高。典型的评价来自于丁来东。丁来东曾说过：“胡适氏虽然是最初提倡文学革命的，但是他不是创作者（诗人）。虽写过《尝试集》这本中国最初的白话诗集，但同它的书名（《尝试集》）一样，只不过是白话诗的一种尝试罢了，称不上是好的诗作品。”²但是，梁白华对胡适白话诗创作意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综上所述，朝鲜现代文坛积极接受了胡适的文化思想和他的白话诗，并对胡适和他的新诗创作以及胡适等人主导的中国新文化文学运动都给予了高度、客观的评价。这对朝鲜新文学以及现代文学发展都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三、胡适对朝鲜新文学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到胡适的新文学思想对当时朝鲜新文学乃至新文化思想的形成与成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笔者认为，胡适对朝鲜新文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探讨：一是树立新文学理论；二是推进实现文学语言的“言文一致”。

首先，考察一下胡适和他的新文学思想对朝鲜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梁白华译介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中，原作者青木正儿注重介绍、评论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这两篇恰恰是在胡适新文学建设主张中是极具分量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早在当时已经备受朝鲜文坛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胡适关于新文学的理论本质及其内涵。

1917年1月1日载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曾具体提到文学改良之“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

¹【韩】参见1930年11月20日《东亚日报》。

²【韩】参见1929年7月26日—8月《朝鲜日报》。

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¹ 胡适主张，要创作“活文学”²（“活文学”是《文学改良刍议》中第一次提到）就必须开创新形式。对此，青木正儿评价称：“只强调文学形式的改良，不重视内容的省察，在内容方面仅列举了‘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两点意见，认为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是胡适思想中不尽如意的地方。”³显然这个评价不够深入、全面。不过，当时的胡适并没有忽略了革新新文学内容方面的问题。

最近，胡适研究专家胡明对胡适的文学理论给予了比较精辟、全面的评价。胡明指出：“我们试观察《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及后来的《逼上梁山》、《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等文字，不难发现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的理论主张有一串不断简化的行动口号：从最初的‘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等‘八不主义’变成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等‘四条原则’，又简化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两句话。——这些行动口号贯穿着两个原理：一、‘死文字绝不能产生出活文学’⁴；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第一条是从形式上讲的，‘死’了的形式装不进去‘活’的内容，故胡适开宗明义为古文‘发丧举哀’，要白话‘承祧大统’。第二条是历史上讲的，真正的活文学必定是创作者当代之文学，表达当代人活的思想、活的感情、活的行为。正因为要表达‘活’的，便须采用“活”的文字形式来表达。这两条原理标志着转型一时的成熟。”

胡明还指出：“胡适理论本质上看，它的功效在把中国文学从形式上‘死’的变成‘活’的，从内容上‘假’的变成‘真’的。合并言之，把文学从‘鬼话’变成‘人话’。‘鬼话’是形式上的‘死’与内容上的‘假’的结合体，而‘人话’则是形式上的‘活’与内容上的‘真’的结合体。它的核心一点便落在‘人’字上。新文学必须是反映人生自身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又必然是为了人生自身的改善与社会现实的改良的。”⁵同时还指出了胡适新文学理论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倾向，这样的评价值得我们参考。

不管怎样，以这两篇文章为中心的胡适新文学理论在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中

¹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²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最为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德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与，国语亦代起。……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

³ 【韩】南允洙、朴在渊等编《梁白华文集》(3)，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5年版，第279页。

⁴ 参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4.15,《新青年》第4卷第4号)，载《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⁵ 胡明著：《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参见第147-148页。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在朝鲜新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梁白华、李允宰¹、李像隐和姜汉仁等朝鲜的现代翻译家、语言学家曾非常关注过中国新文学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新文化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及他的新文学主张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与好感，真诚、积极地接受胡适新文学思想并把它译介到朝鲜。

朝鲜文坛与中国新文学交流的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还是梁白华。作为翻译家梁白华始终以积极、诚恳的态度翻译介绍了胡适有关新文学的文章。除了最初译介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1920.11-1921.1）之外，他还翻译介绍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谈新诗》等文章，以此表现出了作为接受者、传播者对本国新文学运动的无限期望。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由梁白华亲自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1922）。在这篇文章中，梁白华概括地介绍中国的文学革命，同时再次专门翻译介绍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²，并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此后，梁白华还发表了评论《流行反新文学出版物的中国文坛奇现象》（1924）和介绍胡适的《胡适》（1934）等。这些都表明梁白华与之前第一次译介《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一文时期相比，对胡适的新文学思想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梁白华是一位早期朝鲜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曾创作过朝鲜现实主义代表作《痛苦的矛盾》（1918）³等小说。以此身为作家梁白华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同样对文学文体的革新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总之，通过梁白华对胡适文章的译介和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新文学思想的理解和接受是主动积极、认真深刻的。梁白华始终主张结合朝鲜国内的实际情况，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接受包括现代中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思潮和新文学。

作为语言学家李允宰对胡适的接受、介绍同样具有特殊意义。李允宰曾翻译介绍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23），在其序文中，曾这样说道：

“这篇论文是中华民国著名新思想家，现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哲学博士胡适发表曾经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但是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一发表，一时风靡全国，打破二千年的迷梦，让所有的人都以精锐的步伐聚集在他的旗子下。这对崇尚陈旧的死文学的我们朝鲜人会成为最深刻的刺激作用，为此特地翻译（抄译）这篇文章供各位参考。”⁴

序文中可以看出李允宰翻译介绍胡适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为了改变朝鲜国内

¹李允宰曾当过朝鲜语研究会（1921）和朝鲜语学会（1931）的领导人。

²梁白华自称是“抄译”，但实际上是对原文的完整翻译。

³【韩】参见1918年2月《半岛时论》第10号。

⁴【韩】参见1923年4月—5月《东明》第33号。

崇尚“死文学”的现状。这里所说的“死文学”就是与胡适曾经提过的“活文学”（指以白话文创作的文学）相对而言的概念，也就是指以陈旧的文言文所创作的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废除文言文的旧文学，建设白话文学。可以看出李允宰同样积极地接受胡适的新文学思想，主张本国人也要创作反映时代的、文言一致的“活文学”。胡适曾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所提到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¹无疑同样为对朝鲜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20世纪30-40年代朝鲜著名短篇小说家作家李泰俊（号尚虚）也非常关注并接受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他曾经在《文章讲话·1》一文（1939）中明确指出，现代朝鲜语句式首先要符合“文言一致”的标准，“句式是语言的记录，是用文字形式表达的语言，离开语言便无法写出文章。只要文字不转化成会话，只要文字被赋予一定的发音，语句就不可能摆脱语言记录的地位。”²并且，李泰俊批判以往的句式充斥着典故中摘录的他人之言，同时缺乏描写的自然性，并引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指出解决这些现象的方法与方向。当然李泰俊是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解读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主张和观点，强调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主张文学语言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口语体），应避免华丽的套话、典故等。

作为现代“朝鲜短篇小说的终结者”李泰俊是一位始终为自己的母语而感到骄傲的小说家。他认为“朝鲜语”是最佳的描写工具，并指出：“朝鲜语具备语音的放射无限性和语义上敏锐的感觉性，是文学用语的理想语言。整个朝鲜民族都为拥有如此优秀的语言而感到喜悦。”³实际上李泰俊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充分体现出了这种思想观点。

除此之外，胡适的《谈新诗》也对朝鲜新文学起到一定的影响。胡适在《谈新诗》中注重提出传统诗歌形式的改革问题，也就是文学形式问题。胡适举出典型例子具体分析新诗的形式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对诗体的观点。还有在诗的语言问题上也主张创作白话文诗。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胡适不是从专门文学的角度去开拓新诗的，所以不能用纯文学的观点和要求评价。不管怎样胡适的新诗观点同样对朝鲜近代时调包括在内的诗歌革新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还有胡适《实验主义》（李像隐译，1927）和《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姜汉仁译，1935）等文章对朝鲜现代文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实验主义》一文。胡适在《实验主义》中所提到的“实验主义”是以科学和民

¹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5页。

²【韩】李泰俊：《李泰俊文学全集》第16卷，瑞音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文章讲话（1）》是早在1939年2月发表在《文章》创刊号的文章。《文章讲话》是李泰俊的代表著作之一。

³【韩】李泰俊：《李泰俊文学全集》第17卷，瑞音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页。在裴开花《胡适对韩国文学家的影响》（《当代韩国》2007年秋季号）中，第88页再引用。

主为内涵的，是近代西学的正统。这种哲学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文学改良”主张中，还影响着他的整个学术观点和方法。所以，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同样也在朝鲜的文化思想领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其次，胡适的新文学理论为促进朝鲜“言文一致”运动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正处于转型期的朝鲜新文学同样遇到了“言文不一致”的问题。众所周知，因为朝鲜自古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书写方式上，一直使用汉文，“言文不一致”严重影响朝鲜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及其语言发展。朝鲜现代文坛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朝鲜的爱国启蒙家（知识分子）自发地投身于“言文一致”运动。自20世纪初开始的国语使用运动，虽然遇到了不少问题和阻力，但是靠朝鲜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到20年代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不仅对朝鲜语的使用及普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现代文学语言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¹

胡适曾认为，新文学应由“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来创作，并将“言文一致”定为文学革命的基本目标。胡适的“言文一致”主张为朝鲜新文学以及现代文学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朝鲜知识分子也采取各种形式和方法努力推进国内“言文一致”运动。尤其是现代朝鲜代表小说家李光洙和金东仁都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使新语体在朝鲜文学领域中基本确立自己的地位。但是当时旧语体仍占有很大的市场，严重阻碍着新文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文的宗主国所进行的语体改革引起他们极大的重视。实际上，在朝鲜李光洙等人早在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关注“言文一致”问题，主张“言文一致”体创作。1916年李光洙曾指出：

“最近朝鲜小说使用纯国文、纯现代语，这让我欣喜不已。希望这样有生命的文体更加兴旺，并即使使用国汉文混用体，也要用像说话的那样最平易的、最接近日常用语的语言。从日语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30年之前开始由田美妙氏开始主导言文一致以来，不仅在文学作品乃至在科学书、政治、论文等都采用了纯现代语，这对那个国家的文化起到了极大地影响。这是一大进步，故本人认为新文学必须用纯现代语、日常用语，即以任何人都认识而使用的语言来创作。”²

显然这个时期朝鲜文坛的“言文一致”运动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气候，还处于借鉴日本经验探索自己本国文学语言发展之路的过程中。虽然接受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但胡适的新文学主张对这个时期朝鲜新文学运动仍然起到了一定的启发。

¹【韩】裴开花：《胡适对朝鲜文学家的影响》，载《当代韩国》2007年夏季号，第82页。

²【韩】权宁珉编：《韩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资料I），檀国大学出版部1981年版，第46页。参考李光洙的《什么是文学？》。原载《每日申报》1916年11月10日—23日。

同样，当时的朝鲜诗调诗人、国语学家李秉岐(1891—1968，号嘉蓝)也积极接受了胡适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且全身心地参与“诗调复兴”运动，为实现朝鲜诗调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爱国国语学家们的努力给当时朝鲜的“言文一致”运动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前面提过的梁白华和金东仁及李泰俊等作家，都同样积极提倡“言文一致”，并有目的地进行国语创作。特别是当时在日本殖民统治日益加紧，朝鲜的社会文化环境随之逐渐恶劣情况下，他们不断探究和追求国语的最大活用，以此来表达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热爱。

总之，20世纪20—30年代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实用主义》、《中国50年文学史》等文化文学思想，不仅对朝鲜文坛和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朝鲜新文学“言文一致”的改革以及文学形式的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结论

本文从两个方面粗略地考察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胡适及他的文学思想与朝鲜现代文坛的影响关系。

朝鲜现代文坛一度出现“胡适”接受现象，这背后有着它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初，正处于转型期的朝鲜文坛，为谋求自身发展，不断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养分。当时影响朝鲜文坛的外来主流文学是西方文学，而且很多情况下均是通过日本引进的外来文学，但是不少朝鲜知识分子却把目光逐渐投向邻国中国的现代文坛，关注中国新文学发展，并通过各种翻译介绍积极主动地接受和借鉴中国新文学理论和思想，以此要寻求自己发展之路。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是排日思想；二是传统的事大主义文化心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当时的朝鲜人没有太多的自由，爱国文人和知识分子普遍对日本的侵略极具愤恨之情，在文化文学领域里尽量想要排除或摆脱日本的影响。由于接受主体的这种民族情绪的高涨，自然对日本文化文学和通过日本引进的西方文化文学都产生否定或排斥态度。同时这种心态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朝鲜文人对传统的事大主义的怀念和追从。特别是受到汉文化教育的朝鲜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他们普遍对传统友好邻国中国持有好感，而且因为这些文人知识分子本身具有较大语言优势，所以一般都对中国比较了解，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文学。靠这种优越条件他们积极、主动地接受和传播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另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同样属于汉文化圈的朝鲜文坛也遇到了与中国类似的“文言不一致”问题。在这种情况下，20年代初期开始朝鲜文坛逐渐关注和介绍胡适及他的新文学理论。

根据朝鲜文坛对胡适的关注和介绍情况，我们足以看出胡适和他的文化文学思想对朝鲜文坛和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和以白话文为中心的“言文一致”观点对朝鲜现代文学发展以及朝鲜“言

文一致”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对梁白华、李允宰、李秉岐、李泰俊等朝鲜现代小说家和国文学家的影响足以证明胡适的新文学观点和思想具有巨大的魅力。

胡适曾与不少朝鲜文人和知识分子交往，并关心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及民众的命运。这种友谊和交流在中朝两国文学交流史上是值得肯定，其意义也很重大。20世纪20--30年代，胡适与朝鲜文坛的友好而密切的交往和朝鲜对胡适的接受，均对朝鲜现代文学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通过以上的考察发现朝鲜新文学的形成过程不仅受到了通过日本的西方文学影响，而也受到了中国化的西方文学影响。相信本研究为使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20世纪朝鲜现代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坛之间的文学交流关系及其意义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启示。

【参考文献】

- 胡适 著：《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卷），商务印书出版社，1937年。
- 胡适 著：《胡适留学日记》（第三卷），台北·商务印书出版社，1959年。
- 金允植 著：《韩国近代文艺批评史研究》，韩尔（音译）文库，1973年。
-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耿云志 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耿云志 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2卷，影印本，黄山出版社，1994年。
- 阿炳 编著：《国学宗师—胡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 南允洙、朴在渊等编：《梁白华文集》【1-3】，江原大学校出版部，1995年。
-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中、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 欧阳哲生 编：《胡适文集》（1-1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欧阳哲生 编：《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再读胡适》，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
- 胡明 著：《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耿云志 著：《胡适研究论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 房向东 著：《鲁迅与他的论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 宋剑华 著：《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岳麓书社，2008年。
- 耿云志 著：《胡适新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 李锡浩：《胡适文学革命的影响与其接受情况》，《中国文学》第2辑，1974年
- 罗岗：《论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学评论》[J]第4期，1993年。
- 尹允镇：《中国新文学的东进序曲(1917--1929)》，《中国比较文学》[J] 2期, 1993年。
- 崔成卿：《关于胡适新诗的研究》（博士论文），岭南大学，1996年。

权基永：《关于胡适白话文论的研究》（硕士论文），延世大学，1996年。
李廷吉：《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与实践》（博士论文），忠南大学，2003年。
裴开花：《胡适对朝鲜文学家的影响》，《当代韩国》[J] 夏季号，2007年。
尹允镇：《胡适在朝鲜》，《鲁迅研究月刊》[J]第3期，2008年。
徐琨：《崔南善与胡适新诗开拓比较研究》（硕士论文），首尔大学，2012年。

（作者为山东大学韩国学院教授，吉林延吉人。）

胡适和他神龕里的三位大神

张启明

（一）

胡适的下述这段话广被人称引：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龕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这是他在1936年1月9日复周作人的信里的话。之前的1月5日，挚友丁文江去世；上年12月25日，汉奸殷汝耕的“冀省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再往前，自“一二九”运动掀起的大潮更让胡适心力交瘁。他本着一贯的“救国不忘读书”念头，和蒋梦麟一起，想把学生拉回到课堂上来，但收效甚微。故旧凋零，国是日非，胡适的心境异常苦闷。1月7日，周作人致胡适一信，宽慰他：

……为了在君先生的去世，以及报上所载北大学生情形，不禁又想对兄一进言。鄙意对于国事、社会、学生诸方面我们现在可以不谈或少管，此即弟两三年前劝兄勿办《独立评论》的意思，现在却又提起来了而已，朋旧凋丧，青年无理解，尽足为“汔可小休”的理由，还不如专门讲学论学。……

胡适虽是个冷静的人，但他的冷静里蕴蓄着有所作为的热情和对未来的乐观向往，不像周作人这么冰冷。他很快复周作人一信，谢谢周的好意，同时从正面阐明自己的“有为”哲学：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一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接下来，胡适在信里提到了他的三位大神。兹再引一遍：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引用了孔子和王安石、张居正的名言，看起来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渗透着沉痛之感。还在十来岁的娃娃的时候就完成了从有神到无神跨越的胡适，这时又把凡间的人物升格为大神，以安放自己的情感寄托和宗教情怀，充分说明了这时内心的孤苦无助。假如外在形势一片大好，自己又无往而不适，就不会写出这样一篇充满牺牲色彩和悲壮气味的文字了。

(二)

胡适把孔子作为他的第一尊大神，会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人们认为他和反孔的战士们是一路的。虽然他晚年屡屡说自己并不反孔，但他当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平视诸子、赞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等诸多作为，确实让人对他究竟如何评价孔子心存疑惑。在这里，胡适用了抽象继承法，单拎出“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为之”是“为”什么？这个胡适存而不论，他要的只是一种积极的状态，一种勇猛刚健的姿态，要的是“为”本身。将近二十年前，1916年7月29日，他作了题为“孔丘”的白话诗：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由此可知，他对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服膺是其来有自并且一脉相承的。比如在一年半以前所写的《说儒》一文也对孔子极力表彰，在这篇文章中，他给了孔子一个类似于基督教里耶稣的地位。一直到晚年，在台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面折廷争，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这尊大神在撑着他。

胡适把孔子当“大神”，当时却有人把胡适当“孔子”。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登载的郭沫若对该报记者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

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954年12月8日，郭氏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再次提到胡适：“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称胡适为“孔子”为“圣人”的都有谁，我不全知道，但郭氏在这样严肃的场合指出来，当然不会是说谎。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从没有这样标榜过，他从来没有象康有为、章太炎等前辈一样自比孔子。而且，前文已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甚至还是把孔子拉下神坛的一员大将，他给一般社会上留下的印象大概还是反孔的印记比较深刻些。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会有人把他称为孔子呢？在胡适的家乡安徽绩溪，有个叫鄣山大峡谷的景区，景区入口胡适塑像的基座上也刻着“现代孔子”四个大字，胡适家乡的后人们，又是从什么意义上这样称呼这位先贤，抑或还是仅仅地人云亦云呢？

唐德刚曾称胡适为“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假如这一判断能被以后的时间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在这方面，胡适与孔子倒确有可比性。孔子在世的时候，栖栖惶惶，颠沛流离，但始终抱着他的仁和礼不放，而高唱其泰山其颓的自挽歌；胡适在世，虽然早享大名，但实际上是志不得伸的，所以也是抱着他的自由和民主不放而殒志以歿。守死善道，择善固执，“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方面两人是相同的。更往大处讲，虽然时隔2500年，两人对己身所处的中国历史上大的文化转型期关口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意识是相同的，匹夫而为百世师的担当意识也是相同的。不管是“霸王道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中国人不能不认同仁义理智信这一套；同样，不管是中国特色也好，还是中国国情也罢，中国要想走上长治久安的坦途，中国人也不能不认同胡适鼓吹的自由和民主。

（三）

王安石和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大政治家，有彪炳的功业。按照胡适的“不朽”论，他们当然是不朽的，就是按中国古人的“三不朽”论，他们也是不朽的。王安石是兼立功与立言，张居正偏于立功，但胡适之所以把他们与孔子并列为三位大神，更是看重了他自己所引的这两人的各一句话，就是这充满了宗教情感与牺牲精神的自白，使他们在胡适心目中达到了“三不朽”中“立德”的最高境界。

把王、张抬到和孔子同等的地位，尊之为神，这在此前和以后胡适的文章或谈话里都找不到。因之确切地说，这三尊大神，更是胡适在1935-36之间的大神，是他这两年来面对倭患日深、内患孔殷的情势而苦心焦虑、进退失据的紧张焦急

心理的投射。他渴望着能有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大才出来收拾乱局。王、张时代的宋、明政局，和当下的政局颇为相似：中央政府涣散无力，面临外患内忧束手无策，王和张这时候毅然出来担当起重整朝纲的责任，虽然结局不尽相同，但当时都出现了气象澄清、朝野上下为之一振的局面。因此，虽然胡适把王和张尊为大神的原因是本文开头他所引的两人宗教性的自白，但背后却隐含着建立一个建立不世之业的想望。这也透露了胡适内心深处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气质，而与他自己早先标榜的“讲学复议政”的单纯“议政”的西方知识分子传统有所区别。

胡适接触王安石较早，在早年的日记里就有一些零星的记载。比如1911年8月29日，他一大早就起来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深表佩服，“极爱其议论之深切著明，以为《临川集》之冠”，这是偏重于“立言”的一面。回国后，二十年代中期，胡适对社会主义一度颇为好感，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下一步趋向，因此，他在1926年夏秋间赴英经苏途中致张慰慈的信里面，给王安石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封号：“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本之中国史上，只有王莽与王安石做过两次‘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试验”，这是偏重于“立功”的一面。由“立言”、“立功”往上推，就要到“立德”了。1929年5月13日，胡适在日记里抄了王安石的一首诗：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感慨道“真是有得于佛法的话”，并加以发挥：“认为人生如梦，故无所求。但无所求不是无为。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岂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吗？”35年6月19日，又在日记中摘录了王安石的一首与上引意义略同的诗：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然后一直到这次给周作人的复信里引王的“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对王安石“立德”取向就呼之欲出了。王安石向佛找力量，胡适又向王安石找力量，其实，求佛就是求己，就是借佛这个名号把己身的大无畏精神激发出来，做到像胡适自己诗里写的那样，去“干！干！干！”

三尊大神中，张居正是后来者，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就我看到的，张居正最早在胡适笔下出现是1935年，6月19日日记载：

下午读张居正的《全集》。此人自是五百年中第一个大政治家，其魅力最近于王安石，而处境更难，成绩更大。其书牍卷五有《答吴尧山》一书，最为世人传诵，其中有云：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

张居正的这一弘愿深深触动了胡适。这时候的胡适，因为其对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基本认同，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左翼思潮鼓舞人心的情势下，已渐渐失掉了青年导师的地位，“诋毁”甚至“溲溺之，垢秽之”的也大有人在，他看到张居正的这段话，能不兴“于吾心有戚戚焉”之感吗？因此很自然地，来年初周作人的来信给了他一吐积郁的机会，给了他张居正和孔子、王安石并列为大神的会。

王安石被供进神龛之后，胡适以后反不大提到他了。倒是张居正，在胡适与友朋的私人通信中，又有所提及，除了“欢喜施与”的境界，他的功业在胡适心目中份量更加重起来。37年4月8日他致钱玄同信中说：

……为众生入地狱，此意分见各经，《华严》也常提起。如云：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议劫住地狱。其散文部分云：我当为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悉得免出生死沃焦。我当为一切众生于一切刹一切地狱中受一切苦，终不舍离。……何以故？我宁独受苦，不令众生受诸楚毒。……张居正得力的正是这些。“愿以深心奉尘刹”，此中“刹”字与上文“一切刹”之“刹”同……

这里把对张居正的理解心得与老友一起分享。抗战期间，辞去驻美大使后，在与王重民信函往复中，又想起了张居正，并且为张未能在黄宗羲编著的《明儒学案》中占一席之地而大为不平。43年7月24日，寄给王重民一诗，诗题是“偶寄小诗题《明儒学案》”，诗曰：愿将我身作草荐，供人溲溺供人卧。（概括张居正语—胡原注）第一学道有得人，可怜这里无他坐！寄过诗，怕王重民不理解，8月2号又致王重民一信，加以解释：

题《明儒学案》的小诗，只是为张居正说一句不平话。张江陵不重讲学，并且曾禁止北京讲学。故理学家多说他的坏话，《学案》里当然没有他的位子。江陵少年登第，他告假回去了六年，做一番预备工夫，然后出来干政治。他的政治事业，在中国全史上没有人可以比他。但在理学家的眼里，他是理学的仇人！

“他的政治事业，在中国全史上没有人可以比他”，这是多高的评价！又寄寓了胡适对当时国内政治多大的期望啊！

（作者单位：安徽省政协）

《胡适思想批判》作者群体考察和分析

董立功

从现有材料来看，中国大陆对胡适的零星批判应追溯至 1949 年 5 月 11 日。是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与胡适有着几十年私谊的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这封信除了委婉地指责胡适在思想哲学上一直蒙蔽他，在政治见解上向他作错误的引导外，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劝胡适回到新社会。

胡适 6 月 19 日看到这封信后，连续五天在日记里表达了不屑和怀疑¹，但并未立即著文进行反驳。直到半年后的 1950 年 1 月 9 日，胡适在《自由中国》第 2 卷 3 期上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公开表达了拒绝“争取”的强硬态度。关于陈垣出面“争取”胡适一事，国内学术界已有人著文进行专门探讨²，在此不再赘述。可以肯定的是，胡适的对抗性表态最终使大陆下了批判胡适的决心。

中国大陆对胡适的集中批判，共分为两次，这两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虽以学术批判的形式展开，但本质上却是政治运动。

第一次对胡适的集中批判发生于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1 月之间，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不过，第一次“批判胡适”后来由于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三反”运动而于 1952 年 1 月 21 日宣布暂停。

第二次对胡适的集中批判发生于 1954 年 11 月至 1955 年 10 月。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批判的“火力”明显加大，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官方之所以在事隔近三年后重提“批判胡适”，并非领导人心血来潮，而是因为 1954 年 9、10 月间中国文坛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红楼梦》事件”。

1954 年 10 月 10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同日，毛泽东在此文章上作了五条批注。10 月 16 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文中尖锐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

¹ 胡适在 1949 年 6 月 19 日、20 日、21 日、24 日、25 日的日记中都记录了他读《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后的感受，可见胡适对此事的重视。胡适的态度，也由最初的相信“此信不是假造的”到“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火了”，相信此信大部分是“党内作者伪造”的。参《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版，第 416-419 页。

² 参见邓瑞全：《关于〈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载《文献》1999 年第 2 期；邓瑞全：《陈垣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的前前后后》，载《黄河》杂志 1999 年第 5 期；杨金荣：《论 1940-50 年代中共对胡适的积极争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¹文坛上一场看似稀松平常的学术讨论最终因领导人的介入而在政坛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彻底否定态度，反而有通过批判达到争取的意图。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文最后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²

1954年11月后，从中央到地方，第二波批判胡适思想的会议相继召开。后来中国学界所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通常指第二次对胡适思想的集中批判。

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作者王若水回忆说：“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实际上我只是奉命，当时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原来，是邓拓找到负责理论的王若水，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报纸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呀。邓拓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³

11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文化艺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⁴的向记者的谈话，发出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号召。紧接着，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等人组成的“批胡”委员会，召开中国科学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从9个方面入手批判胡适的计划草案。12月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将经过修改的计划向毛泽东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次日，毛在这份报告上立即批示：“照此办理。”⁵

当时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顾颉刚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关于此次批判运动的一些内容。顾颉刚从1954年11月14日起频繁提及因“《红楼梦》事件”而起的批判胡适运动。11月1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王崇武来，长谈。看文艺协会召集之《红楼梦》座谈会记录。”⁶11月15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今晚为一、二所开会讨论《红楼梦》问题，来函邀去参加。予不欲往，而静秋逼令必往，遂致口角……”⁷

¹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

²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5页。

³ 王若水：《读〈中国思想运动史〉》，转引自于继增：《〈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8期。

⁴ 这篇谈话后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成为批判胡适思想的总概文。

⁵ 于继增：《〈红楼梦〉研究风波实录》，载《文史精华》2005年第8期。

⁶ 《顾颉刚日记》，第七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614页。

⁷ 《顾颉刚日记》，第七卷，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5月版，第614页。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在其日记中也开始频频提及胡适思想批判问题。1954年12月1日，夏鼐在日记中写到：“郭院长至陈梦家君处谈石鼓文问题，顺便至我处，谈及批判胡适思想问题，谓“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应改为“小心地假设，大胆地反证”，使不致落入唯心论的陷阱。”¹12月25日，夏鼐在日记中写到：“上午写信给洛阳队及西安队，与靳主人（主任？）谈工作站问题。下午赴干部学校听潘梓年同志作胡适思想批判报告。”²1955年1月7日，夏鼐在日记中写到：“下午赴院参加“批判胡适实用主义”讨论会，艾思奇报告，发言者有贺麟、胡绳、王子野等同志。”³

当时远在重庆的吴宓也未能幸免。他供职的西南师范学院不仅要求吴宓参加各种批判会议，而且要求他在报纸上写检讨文章。1954年11月19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今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批判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用马列主义观点驱除胡适派之资产阶级唯心论之斗争），在重庆新民街三号文联会所召开座谈会。……此运动（据重庆市宣传部长任白戈报告）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⁴11月2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连日读报，各地批判《红楼梦》研究之运动甚嚣尘上，宓在势无可逃，又须巧为词说，自责自涤，以此心极不乐。”⁵12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出遇李一丁，命撰《红楼梦》检讨文登报。”⁶

在第二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以北京为中心，上海、天津、济南、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报刊均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胡适的文章。这些批判文章后来由三联书店汇编成册，编成《胡适思想批判》（1-8辑）。之所以选择由三联书店出，而不选择政治性更强的人民出版社，主要是因为三联书店早在1951年已并入人民出版社，“成为只有出书名义而无实体的副牌社。”⁷从1951年到1986年三联书店重新独立的几十年间，三联书店与人民出版社之间的“分工”还是较为明确的。凡是“文化味儿”浓的、作为批判用的“内部读物”，大都由三联书店出；凡是“政治性强”的、运动中必须学习的小册子，大都由人民出版社出。⁸

¹ 《夏鼐日记》，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29页。

² 《夏鼐日记》，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33页。

³ 《夏鼐日记》，第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135页。

⁴ 《吴宓日记》，续编II，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65页。

⁵ 《吴宓日记》，续编II，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69页。

⁶ 《吴宓日记》，续编II，三联书店2006年3月版，第82页。

⁷ 参见宋木文：《我愿做个三联人》，载《读书》2012年第6期。

⁸ 参见雷颐：《我与三联：“读书”与“胜读书”》，载《读书》2012年第6期。

当然,《胡适思想批判》(1-8辑)并非批判胡适文章的全部,只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及其他主要报刊上的部分文章,但已具有足够代表性。《胡适思想批判》(1-8辑)共收录了173篇文章,涉及164位作者。本文之所以选择《胡适思想批判》(1-8辑)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因为:1、选取文章的内容具有广泛性,涵盖了批判胡适的诸多方面;2、批判文章的作者具有代表性,既有胡适的同事、朋友,也有胡适的学生;3、选取文章的类型具有多样性,既有应景的跟风式文章,也有严谨的学术型文章。

为便于统计和开展研究,笔者以三联书店1955年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1-8辑)的164位作者为考察对象。从164位作者的年龄、籍贯、受教育情况、留学情况、当时供职单位、发表批判文章篇数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从这个侧面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进行解读。在164位作者中,可以查到部分或全部信息的作者共142位,详见下表:

《胡适思想批判》作者情况简表

(共142位,按姓氏音序排名)

作者	生卒年	籍贯	受教育情况或毕业院校	留学情况	当时供职单位	文章篇数
艾思奇	1910-1966	云南腾冲	早年留学日本	留日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2
白寿彝	1909-2000	河南开封	燕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
鲍正鹄	1917-2004	浙江鄞县			复旦大学	1
蔡尚思	1905-2008	福建德化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1
蔡 仪	1906-1992	湖南攸县	北京大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九州帝国大学	留日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	1
曹道衡	1928-2005	江苏苏州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曹 孚	1911-1968	江苏宝山	复旦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留美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陈丁沙	1929-	广东省	燕京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1
陈鹤琴	1892-1982	浙江上虞	清华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南京师范学院	1
陈炜谟	1903-1955	四川泸州	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	1
陈友松	1899-1992	湖北京山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北京师范大学	1
陈元晖	1913-1995	福建福清	南京中央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陈中凡	1888-1982	江苏盐城	两江师范学堂;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1
褚斌杰	1933-	北京市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戴镛龄	1913-1998	江苏镇江	英国爱丁堡大学	留英	中山大学	1
刁云展	1927-	山东郓城	山东大学		《辽宁日报》	1
丁则良	1915-1957	北京市	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
范文澜	1893-1969	浙江绍兴	北京大学, 后赴日本留学	留日	中国科学院	1
冯友兰	1895-1990	河南唐河	北京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北京大学	2
冯沅君	1900-1974	河南唐河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		山东大学	1
高亨	1900-1986	吉林双阳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1
高觉敷	1896-1993	浙江温州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香港大学		南京师范学院	1
高一涵	1885-1968	安徽六安	日本东京明治大学	留日	南京大学	1
葛力	1915-1998	直隶顺义 (今北京)	燕京大学; 美国南加 利福尼亚大学	留美	中共中央马列 学院	2
葛懋春	1926-1996	安徽肥西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1
郭沫若	1892-1978	四川乐山	日本九州帝国大学	留日	中国科学院	3
郭预衡	1920-2010	直隶玉田 (今河北)	辅仁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
韩文佑	1907-1991	北京通县	清华大学		天津师范学院	1
韩允符	1901-1984				东北人民大学	1
何干之	1906-1969	广东台山	日本早稻田大学; 明 治大学	留日	中国人民大学	1
何家槐	1911-1969	浙江义乌	上海中国公学; 上海暨南大学		中共中央马列 学院	2
何其芳	1912-1977	四川万县 (今重庆)	北京大学		中国文联, 中国 作协	1
何思敬	1896-1968	浙江杭县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留日	北京大学	1
贺麟	1902-1992	四川金堂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 科学院	2
侯外庐	1903-1987	山西平遥	北京法政大学;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2
胡华	1921-1987	浙江奉化	陕北公学		中国人民大学	1
胡念贻	1924-1982	湖南长沙	南京中央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胡曲园	1905-1993	湖北江陵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1
胡绳	1918-2000	江苏苏州	北京大学		中共中央政治 研究室	2

黄汉生	1919-1987	广东番禺	中央戏剧学院		广东省戏剧家协会	1
黄美复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黄枏森	1921-	四川富顺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2
黄药眠	1903-1987	广东梅县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1
嵇文甫	1895-1963	河南汲县 (今卫辉)	北京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	留苏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大学	2
江 柱	1929-	湖南省	武汉大学		《长江日报》社	1
金应熙	1919-1991	广东广州	香港大学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	1
金岳霖	1895-1984	湖南长沙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北京大学	2
黎少岑	1908-1979	湖北天门	武昌中山大学； 武汉大学		武汉市人民政府	1
黎 澍	1912-1988	湖南醴陵	北京大学		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	1
李长之	1910-1978	山东利津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2
李 达	1890-1966	湖南永州	日本帝国大学	留日	武汉大学	3
李光璧	1914-1976	河北安国	北京大学		河北大学	1
李庆聪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林淡秋	1906-1981	浙江三门	上海大同大学； 上海大学		《人民日报》社	1
林 彦	1927-	重庆			《西南文艺》杂志社	1
刘付忱	1911-2003	河北行唐	北京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 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河北师范学院	1
刘绶松	1912-1969	湖北洪湖	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武汉大学	1
楼 栖	1912-1997	广东梅县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1
卢婉清	1921-	浙江黄岩	浙江大学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1
陆侃如	1903-1978	江苏海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1
绿 藜	1930-	河南潢川	中原大学		《湖北日报》社	1
罗尔纲	1901-1997	广西贵县 (今贵港市)	上海中国公学		中国科学院	1
罗根泽	1900-1960	直隶深县 (今河北)	清华大学；燕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罗克汀	1921-1996	广东番禺	广东文理学院		中山大学	3
马清健	1928-	广东台山	燕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1

麦若鹏	1918-	广东台山	广东文理学院		安徽大学	1
毛礼锐	1905-1992	江西吉安	南京东南大学；英国伦敦皇家学院；美国密执安大学	留英、留美	北京师范大学	1
毛 星	1919-2001	四川德阳	延安鲁艺、陕北公学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	1
孟宪承	1899-1967	江苏武进	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	留美；留英	华东师范大学	1
孟志孙		天津市			南开大学	1
潘懋元	1920-	广东揭阳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1
潘允中	1906-1996	广东兴宁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1
潘梓年	1893-1972	江苏宜兴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2
庞 朴	1928-	江苏淮阴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	1
乔 彬	1923-	辽宁旅顺	长春建国大学			1
全增嘏	1903-1984	浙江绍兴	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	留美	复旦大学	1
任继愈	1916-2009	山东平原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3
荣孟源	1913-1985	山东宁津	北平中国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沙 英	1917-	江苏铜山	延安陕北公学、延安抗大		《人民日报》社	1
邵鹤亭	1902-1966	江苏宜兴	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东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
孙定国	1910-1964	山东乳山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1
孙思白	1913-2002	山东历城	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山东大学	1
谭丕模	1899-1958	湖南永州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
陶 阳	1926-	山东泰安	华东大学、山东大学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
田余庆	1924-	湖南湘阴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童书业	1908-1968	安徽芜湖	上海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		山东大学	2
汪子嵩	1921-	浙江杭州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2
王崇武	1911-1957	河北雄县	北京大学；英国牛津大学	留英	中国科学院	1
王庆淑		湖北孝感	南京中央大学		北京大学	2
王若水	1926-2002	江西泰和	北京大学		《人民日报》社	3
王文琛	1922-1987	四川夹江	四川万县师范学校；上海法学院		重庆人民出版社	2

王 瑶	1914-1989	山西平遥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2
王雨田	1928-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2
吴景超	1901-1968	安徽歙县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芝加哥大学	留美	中国人民大学	1
吴文祺	1901-1991	浙江海宁	南京金陵大学		复旦大学	1
吴徵镒	1916-	江苏仪徵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吴忠匡	1916-2002	上海市	上海光华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1
夏康农	1903-1970	湖北鄂城 (今鄂州)	法国里昂大学	留法	中央民族学院	1
夏 鼐	1910-1985	浙江温州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夏 澍	1929-2007	河南汝阳	同济大学		《中国青年》杂志社	1
夏甄陶	1931-	湖南安化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萧超然	1929-	湖南临港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1
徐绪典	1914-1996	天津市	燕京大学; 美国纽约大学	留美	山东大学	1
徐之梦	1921-	吉林延吉	东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颜振奋	1929-	福建永春			中央戏剧学院	1
杨荣春	1909-2004	广东龙川	上海暨南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1
杨招棣	1930-	浙江黄岩	浙江大学		杭州大学	1
杨锺健	1897-1979	陕西华县	北京大学; 德国慕尼黑大学	留德	中国科学院	1
以 群	1911-1966	安徽歙县	日本东京政法大学	留日	上海电影制片厂	1
弋 丁	1926-	江西安福	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学院	1
阴法鲁	1915-2002	山东肥城	北京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	1
游国恩	1899-1978	江西临川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余崇健	1926-	湖南岳阳			北京大学	1
余冠英	1906-1995	江苏扬州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
袁良义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曾文经	1917-1979	广西靖西	华北联合大学		《人民日报》社	1
詹安泰	1902-1967	广东饶平	广东高等师范; 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	1
张毕来	1914-1991	贵州炉山 (今凯里)	浙江大学		东北师大; 华东师大; 人民教育出版社	1

张恩慈	1928-	辽宁盖县	东北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1
张继安	1930-	江苏南通	哈尔滨外语学院;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张晋藩	1930-	辽宁沈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1
张俊彦	1925-2010	广西平乐	广西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张凌光	1904-1974	江苏泗洪	陕北公学		《人民教育》杂志社	1
张 沛	1922-	江苏镇江	延安抗大四期、鲁艺二期		新华社东北分社	1
张清常	1915-1998	贵州安顺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内蒙古大学; 北京语言学院	1
张世英	1921-	湖北武汉	西南联合大学		北京大学	1
张志岳	1911-1993	江西余干	清华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1
章世鸿	1927-	浙江宁波	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人民日报》社	1
赵淡元	1926-	湖南岳阳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1
赵俪生	1917-2007	山东安丘	清华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1
赵 凌					山东大学	1
赵卫邦	1908-1986	河北深县	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	1
郑鹤声	1901-1989	浙江诸暨	南京高等师范学堂		山东大学	1
郑林庄	1908-1985	广东中山	燕京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留美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1
钟敬文	1903-2002	广东汕尾	海丰县陆安师范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2
周谷城	1898-1996	湖南益阳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复旦大学	1
周家本					北京大学	1
周来祥	1929-2011	山东青城 (今高青)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1
周一良	1913-2001	安徽东至	燕京大学; 美国哈佛大学	留美	北京大学	2
朱伯崑	1923-	河北宁河 (今天津)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
朱玉湘	1928-	山东昌邑	山东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	1
朱作云					山东大学	1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出版人名词典》（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9 年版）、《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当代名人录》（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学者大辞典》(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 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生平检索》(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7 年版)、《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相关辞书及网络资料整理而成,如有错、漏一概由本人负责。

除了表中的 144 人之外,尚有无法查出具体情况的作者 22 位,分别是:甘霖、耿直、江山、刘中华、姚虹、北中、陈书、黄美德、韩落、何鹏、金陶斋、李泽深、梁灏、马特、马国藩、孙力行、汪毅、王璜、徐仲勉、许世华、杨正典、张绪荣。尽管如此,获得相关信息的 142 位作者已占总数 164 的 86.59%,完全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并不至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

一、从作者的年龄结构来看。在 142 人中,已获知具体生卒年的共 134 位。在 132 位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 1885 年的高一涵,当时已 70 岁;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 1933 年的褚斌杰,当时仅 22 岁。各年龄阶层分布情况如下:出生于 1885 至 1894(当时年龄介于 60 至 70 岁之间)的共 7 位,出生于 1895 至 1904(当时年龄介于 50 至 60 岁之间)的共 30 位,出生于 1905 至 1914(当时年龄介于 40 至 50 岁之间)的共 38 位,出生于 1915 至 1924(当时年龄介于 30 至 40 岁之间)的共 31 位,出生于 1925 至 1934(当时年龄介于 20 至 30 岁之间)的共 28 位。可见,批判文章的作者涉及了老、中、青各个年龄阶层,以中、青年为主。

二、从作者的受教育情况来看。在 142 人,已获知毕业院校或受教育情况的共 133 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例如:在北京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36 人,在清华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19 人,在燕京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9 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含陕北公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9 人,在西南联合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7 人,在山东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5 人,在南京中央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3 人,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有求学经历的共 3 人,在上海暨南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武汉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浙江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厦门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广东文理学院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在香港大学有求学经历的共 2 人。可见,批判文章的作者大多数毕业于中国当时的知名大学。另有 28 人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其中,留美的 14 人,留日的 9 人、留英的 4 人¹,留法的 1 人、留德的 1 人、留苏的 1 人。

三、从作者的职业和单位分布来看。在 142 人中,已获知工作单位的共 141

¹ 其中孟宪承、毛礼锐二人既留过美,也留过英。

位。除了少数人为政府官员和报刊记者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国内大学的教授¹。如当时供职于北京大学的共 29 位，供职于中国科学院的共 14 位，供职于山东大学的共 13 位，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共 10 位，供职于中山大学的共 7 位，供职于复旦大学的共 6 位，供职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即中共中央党校前身）的共 6 位，供职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东北人民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南开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南京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武汉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四川大学的共 2 位，供职于厦门大学的共 1 位。可见，批判文章的作者以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等为主，涉及到的高校从东北到西南，从华北到华南均有分布。这与谢泳先生在《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²一文中的判断基本一致。

四、从作者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看。有的是夫妻，如陆侃如与冯沅君为夫妻；有的是兄妹，如冯友兰和冯沅君为同胞兄妹；有的是师生，如朱玉湘曾师从童书业、赵俪生等人，罗根泽曾师从冯友兰等人，汪子嵩、黄树森等曾师从金岳霖；有的是同事，如胡绳和黎澍当时都供职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的是同学，如李庆聪和黄美复 1951 年同时毕业于燕京大学；有的是同乡，如周来祥和刁云展，两人同为山东人，并合写了《彻底摧毁反动的实验主义的美学体系》（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三联书店 1955 年版，第 246 页）。

五、从作者发表文章的篇数来看。当时写批判文章达到 3 篇的有郭沫若、李达、罗克汀、任继愈、王若水等五位；文章达到 2 篇的有艾思奇、冯友兰、葛力、何家槐、贺麟、侯外庐、胡绳、黄树森、嵇文甫、金岳霖、李长之、潘梓年、童书业、汪子嵩、王庆淑、王文琛、王瑶、王雨田、钟敬文、周一良等 20 位，其余全部是 1 篇。需要注意的是，除何家槐、侯外庐、李长之、童书业、王瑶、钟敬文、周一良等 7 位外，其余 18 位作者全部来自哲学专业，由此可见胡适的哲学思想是当时批判最集中的目标。

1954 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涉及学者数量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可谓空前。此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将学术活动与政治运动强行结合在一起。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建国后大陆知识分子一次比较重要的集体亮相，但这次亮相对当政者和知识分子本身都是一种伤害。虽然批判胡适的一百余篇论文也试图按照学术文章的规范进行写作，但正如胡明先生后来总结得那样：“毋庸讳言，

¹ 批判文章的作者之所以大多来自高校，姜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个中缘由：“1949 年以后的最初几年，文艺界与大学很少联系。是 1954 年的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的运动，改变了这种局面，批判的任务促使我们向老教授们求援。”（参：姜弘：《综观百家、洞流溯源——重读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载《书屋》2007 年第 12 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单纯由文艺界发起这场批判运动有一定难度。

² 谢泳：《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载《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5 月版，第 235-236 页。

这三百万字的批判文章，从题目、论旨、观点、材料、证例到文风、语式、思维程序、习惯用词，雷同重复的不少，操持剪刀糍糊东拼西贴的更多。”¹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却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

在1955年4月出版的第三辑的目录后，附有一个“出版说明”：“本书此次重印时，抽出原先的两篇文章，页码不及改订，故缺95-106页及191-202页”。被临时抽下的是谁的文章？为什么要抽下？《胡适思想批判》（第三辑）对此未加说明。笔者到图书馆找到一版一印“第三辑”与手上的“重印本”相对照后，发现被抽去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彭柏山的《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发表于《解放日报》1955年2月7日）和王元化的《胡适派文学思想批判》（发表于《解放日报》1955年2月5日）两文。令人唏嘘的是，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在1955年5月中旬就突然被捕入狱，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最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²；王元化则从1955年6月开始被隔离审查，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到1957年底才得以回家。学者们本以为写完文章即有了护身符，不料风暴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批判胡适时站在批判者位置的学者们，在后来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很多人纷纷成为被批判的对象³。学者用学术研究去刻意迎合政治运动中的某些需要，不仅使学术研究失去了意义，而且也给其自身的命运罩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董立功，厦门大学历史系2011级博士生）

胡适与陈独秀政治思想从对立到殊途同归

苏育生

胡适与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五·四”运动以后，在思想和政治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歧与对立，以至后来分道扬镳，各走自己的路了。但

¹ 胡明：《胡适传论》（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040-1041页。

² 雷颐：《彭柏山的悲剧人生》，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5月15日。

<http://www.eeo.com.cn/2012/0515/226463.shtml>

³ 如：丁则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他不甘受辱，自沉于北京大学未名湖。刘绶松，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他妻子张继芳是该校职员。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1969年3月16日刘绶松、张继芳夫妇一起上吊自杀。何家槐，在1966年初夏被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而遭批斗。其后迫害不断加剧。1969年2月在监禁中患脑溢血逝世，年仅59年。李长之，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

令人感到惊异的是，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却又回归到胡适一贯主张的“民主自由”上来，并得到胡适特别的欣赏和赞同。

(一)

1919年6月的某晚，陈独秀拿着印制好的《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传单，到新世界娱乐场的屋顶向下散发，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暗探抓捕。经过社会各界大营救，最后由安徽同乡保释，陈独秀被关押了三个多月之后获释。此后，陈独秀以请长假的名义离开北大，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秘密南下，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此走上了终身革命家的道路，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陈独秀到了上海，也将《新青年》带到这里，由他和陈望道等继续编辑，由此刊物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鲜明了。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给胡适、李大钊等编委写信，就今后是否继续办刊物及编辑人等问题，提出：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胡适经征求其他编委意见，并由他们写出书面意见，于1921年1月3日，归纳后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三个办法：一、鉴于《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发一不谈政治的声明；三、停办（这是陶孟和的意见）。对此，陈独秀显然有所动气，认为这是反对他个人。五天之后，即1月9日，他给胡适、李大钊等九人写信，针对三条办法逐一答复：对第三条，他说“自己停刊”，不知孟和的“理由何在”？对第二条，他说“弟虽离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至于第一条，他说“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陈独秀的信，火气很大，大有与胡适，包括在京的大多编委彻底决裂之势。胡适见信后，深感“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强调“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为避免再引起“误会”，最后他表示取消原来的意见，包括取消不谈政治的声明，只保留“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尽管如此，《新青年》编辑部还是没有再回到北京，在上海办了一年多后，又移到广州编辑，逐渐变成中共的理论刊物。实际上，《新青年》的分裂，不是一个单纯编辑地点和编辑人员的问题，而是陈独秀与胡适在政治思想上出现明显分歧，已经无法继续走在一股道上了。

1930年底，胡适由上海回到北京，又翻检出这批来往信件，他在1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理出我和独秀争论《新青年》移北京编辑事的来往信件一束，此事甚有关近年思想史，我几乎记不起此中曲折情形了。”

(二)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经常为某些问题引起论争，甚至公开进行批评与指责。

1923年元月，蔡元培因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非法要求逮捕北大兼课教师、财政总长罗文干，“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遂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在北大掀起“驱彭挽蔡”事件。陈独秀站在激进主义立场上对此大加非议，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胡适则全力支持这一举动，赞扬蔡元培是“久不见经传”的真正的“志士”，特别在“政客”与“猪仔”遍于国中之时，更应该“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在此，他还不点名地暗示与批评陈独秀也是“今天谈共产主义，明天不妨做教育次长”的政客（因为陈独秀曾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2月开始，以张君勱与丁文江为代表，掀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后来由亚东书局以《科学与人生观》为名结集出版，并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作序。胡适本来就是在背后支持丁文江的“科学派”（实际是实证主义），现在走向前台依然批评张君勱的“玄学派”（实际是文化保守主义）。而陈独秀从未参加论战，现在抱病欣然命笔，他这时既受到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又服膺于历史唯物论，所以一方面反对“玄学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对“科学派”的实证主义提出更多的批评。因为陈独秀在他的序文最后，直接“请问”胡适：到底是“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勱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于是这就有了后来胡适序中“附注”的《答陈独秀先生》和陈独秀的《答适之》。他们主张的差别在于，陈独秀强调“唯物的历史观”是根本的思想，但不限于历史，还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它也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的现象存在，但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基础上的建筑物，而非经济基础本身。胡适从实证主义出发，也表示欢迎“唯物史观”是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但强调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事同样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所以，陈独秀批评胡适的说法是“二元论”的唯物论，张君勱必然会“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而胡适说陈独秀也不曾将“唯物史观”说得十分明白，因而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他还反问陈独秀：若不相信思想知识等的重要作用，那他尽可以“袖着手坐等经济组织的变更”，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工作，谋思想的革新呢？”。

如果说，陈独秀与胡适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主要还偏重于思想理

论上分歧；那么，针对北京发生的火烧《晨报》馆事件不同态度，则更显示胡适与陈独秀政治思想上的明显对立了。

北京《晨报》是具有保守的“研究系”党派色彩的报纸，此前在徐志摩主编的该报副刊上，曾开辟《对俄问题专号》，公开讨论帝国主义有无“赤色”与“白色”问题，实际上是否定苏俄的多而肯定的少。1925年11月底，在北京的一次群众示威游行中，有一部分具有激进思想的人到了宣武门外，放火烧了《晨报》报馆。

这时，胡适住在上海亚东书局汪孟邹家中养病，陈独秀有次来看望他，谈话间很自然就说到火烧“晨报”这件事。虽然现在很难知道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争论的，但从保留下来的1925年12月间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不难看出为此事他们都动了感情，大伤了和气，甚至宣布互为“仇敌”了。陈独秀对胡适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这一句反问的话，五六天后一直萦绕在胡适的脑海中，所以他终于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进一步表明彼此之间难以愈合的分歧。

胡适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他对陈独秀说：“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哪一点呢？就是胡适反复强调的“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认为，他和陈独秀都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而“争自由”的核心，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现在陈独秀认为《晨报》“该烧”，那他就是“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所以“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在胡适看来，他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所以胡适说，“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令胡适特别感到可怕的是：如果“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火烧《晨报》馆，虽然只是一个具体事件，但胡适与陈独秀的不同态度，表明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三）

1932年10月，陈独秀以“危害民国罪”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逮捕。这时陈独秀早已被中共撤销总书记，并开除党籍；另成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并

担任总书记。最终经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陈独秀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拘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在国内全面抗战的局势下，胡适、张伯苓、陈仲凡等社会名流联名要求保释陈独秀，经过陈独秀的再三抗争，陈独秀终于以无任何附加条件获释，在四年后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陈独秀，已被托派组织开除了他的党籍和职务，他完全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人。但他坚持抗日民族大义，断然拒绝有人拉拢他到国民党政府当官，也没有达成与中国共产党的再次合作，最后选择了移居到四川东部一个叫江津的小县城，在那里度过了他凄苦的晚年。

这时，胡适奉命远在美国担任大使。

据陈独秀的老友汪孟邹写给胡适的信说，陈独秀开始每日为《时事新报》撰文两三篇，每篇三四十元，借以维生。后来胃病及高血压老病复发，以至不能低头写字，生活十分凄苦。汪孟邹希望胡适能为这位高龄老友助一臂之力，想办法让他赴美游历旅行，恢复身体；在美能像林语堂那样卖文，或像陶行知那样演讲的办法，能使生活无虞。胡适答应帮助他，但陈独秀却拒绝了胡适希望他到美国去写自传的邀请，始终没有离开江津。他晚年的生活，正如他的一首诗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他一直拖着病体，写了不少政论性文章（包括书信），还进一步完成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著作。1942年5月27日，一生秉性刚烈的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悄然离开了人世。第二年元月20日，胡适从收藏家陈树堂给他的信中，知道陈独秀已经去世的消息，他在回信中说：“来书提及仲甫，已于去年五月作古人了，念之慨叹。”

（四）

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后，却几次接触到与出版陈独秀遗著有关的事

1947年10月，胡适收到陈仲凡教授的来信，说有位叫何之瑜的原北大学生，曾在江津照顾过陈独秀的晚年，正在整理编辑陈独秀的遗稿，大多就绪，已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胡适能给他以工作和出版方面的帮助。此后，何之瑜多次写信给胡适（可惜胡适的回信现在看不到了），谈他关于整理陈独秀遗稿的事。他已编成《独秀丛著》，主要是关于文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包括《字义类例》《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实庵字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小学识字教本》等专著。鉴于胡适与陈独秀长期的关系，胡适又曾给他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写过序，由亚东书局出版，何之瑜说《独秀丛著》必须要有的“总序”，非胡适莫属。胡适答应为《独秀丛著》写“总序”，让他抄寄陈独秀遗著上的序言，还嘱咐他将《独秀丛著》的总目改“册”为“卷”等。

实际上，胡适却迟迟没有动手写“总序”，由何之瑜的信中似乎能看出其原因：一是胡适估计此书马上要出版不大可靠，因为何之瑜几次提出要他给商务方面说话，或给张元济写信，希望不要将已排的《独秀丛著》停下来。二是何之瑜催促胡适写“总序”有点命令的口气，好像此书不能出版乃因等待“总序”的缘故，如说“您总要在最近抽空写出来给我才好”，“无论如何要请您在最近一周以内寄来”，“只等您的总序来到，就马上出版”等，这可能让胡适感到不快。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此时国共两党的内战已趋于激烈，北平也面临危急，胡适认为此时出版《独秀丛著》可能不合时宜，他也没有太好的心情写序。所以胡适最终没有写这个“总序”，商务也没有出版《独秀丛著》。

1948年底，北大50周年纪念会前夕，胡适乘坐南京的专机离开北平。在南京，他心绪很不好，却对偶尔看到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小册子极感兴趣。原来，陈独秀去世后，他的朋友将他晚年写的政论性文章（包括书信），编辑成《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出版。1949年2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说：“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过了一个多月，4月6日，随着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垮台，胡适也独自一人从上海坐着克里夫兰总统号船离开中国，向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驶去。在轮船行驶途中，胡适将这个小册子改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并为它撰写序言，后来将它出版了。

他在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胡适所说的对“民主自由的见解”，指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写的政论性文章或书信。这时的陈独秀，自称：“我只注重于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我的根本意见》）还说：“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知识实施的范围广狭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给西流等的信》）对此，胡适说：“这个简单的答复，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

十年后，胡适回到台湾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有一天收到北大学生、香港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孤帆的信。他告诉胡适准备选印《独秀文存》，询问他收集陈独秀著作的情况，并请他写篇“介绍陈独秀思想”的文字。1961年6月5日，胡适给李孤帆回信，告诉他几十年前出版有《独秀文存》，十二年前自己作序印行

有《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实庵自传》。他着重说了对“最后见解”的赞同：陈独秀的“遗文是无法全部收集出版的，他做共产党时代的文字既无法搜全，也无法出版。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的”。后来，可能李孤帆再次给胡适写信谈及此事，过了两个多月，8月28日，胡适给李孤帆回了信，直截了当地说：“我对于你选印《独秀文存》的事，颇不热心。”他谈了三点理由：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来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第二，“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很浅薄的”，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他认为李孤帆“不是一个理想”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在信中，胡适再次特别指出，陈独秀真正值得表彰的思想，是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在这里，胡适说陈独秀是“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老革命党人”，倒也符合实情；但说他“早年的思想大都很浅薄”，只有晚年的思想“值得表彰”，就多少有点受自己的政治立场所左右的了。

十几年前读到《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胡适就觉得他晚年的思想，与自己一贯倡导与追求的“民主与自由”不谋而合；经过几十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陈独秀与胡适，最终又走到一个共同的思想理想上来了。

(作者单位：西安市文化局)

敬悼周汝昌先生

宋广波

午前突得噩耗：周汝昌先生走了。乍闻此信，既惊又痛，即电询周伦玲女士。伦玲女士告知：周公今晨1时59分在家中长逝；并说尊重父亲遗愿，后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告别仪式。周先生因1947年发表考证曹雪芹卒年的文章而涉足“红学”，迄今已逾65个年头。其间，历经风雨、坎坷与喧嚣，而今驾鹤西去，让他安静离开，未尝不好。再者，对一个学者来说，认真总结其学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光大、创新，这恐怕是最好的纪念了。

在20世纪红学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是由胡适开创的“新红学派”，而胡适、俞平伯、周汝昌是成绩最大的三位学者。作为“新红学”的最后一员大将，

周汝昌受乃师胡适影响最大，胡适曾多次说：周汝昌是他“‘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所谓周之受教于胡，不过“平生一面”、私札 6 通而已。然对有根柢、有悟性的可造之才来说，只要稍经大师点拨，即能发生质的飞跃，也不必非要“耳提面命”的。细研胡、周 1948 年之往来函札，再证之以周先生后来的学术道路，二人之师承渊源不言自明。早在 1940 年代末《红楼梦新证》创稿之初，周汝昌就将其研究定位在“《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考证”上：无论是研究的问题，还是研究的路径，都是跟着胡适走的。胡适提出，考证《红楼梦》应从三方面入手：作者、版本和时代，而《新证》一书重点是考证作者和时代，主要在这两方面挖掘新材料，提出新看法。这是在“新红学”沉寂 20 多年后横空出世的一部“力作”，胡适认为其学后继有人，因而备极赞赏。该书曾用“妄人”、“风头主义”之类的字眼骂胡适，这类骂人话共有 5 处，但胡适毫不介怀。后来周先生曾做出解释：原文非如此，这是为了过出版关，由责任编辑加上的；而是书责任编辑也出来作证，则此说非孤证，可信。此外，还有旁证：在周 1949 年完成、1950 年发表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就毫无对胡适不敬之语。要之，这些所谓“骂人话”乃至后来的批判，都是特殊年代的产物：假如没有当年的批胡运动，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如今，周先生也成了“历史人物”，必须要讲清楚的。

1948 年，周汝昌曾向胡适提出要做《红楼梦》的“集本校勘”工作，胡适表示：这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是这最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胡适在离开北平之前，确实兑现了他的承诺。然一年之后，胡、周即成“隔世”之人；又过十年，胡适逝世，遗憾的是他直到临终也未看到周汝昌的“新校本”。但周对当年宏愿，刻未停止。他与乃兄祐昌“力作全面大汇校”，历五十年苦功终成，但因部头太大，难以出版行世，连连碰壁。直至 2004 年，10 巨册《石头记会真》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梓行。这部浸淫着兄弟父女两代三个人心血的《石头记会真》，也算是“血泪之书”了。汝昌校红，目的在“寻求雪芹原稿文词包括书写方法的本来面貌”。笔者与几位学界前辈探讨该书的共识是：其佳胜之处不胜枚举，堪称学术精品。

历数周汝昌先生 60 余年的红学研究，都植基于 1940 年代末。周先生曾一度将“红学”的内容概括为四方面：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这种表述，恰是源于“新红学”。其中曹学、版本学乃胡适最早提出的研究命题，而脂砚斋研究也是支撑新红学的重要支柱，至于所谓“探佚学”，完全来自胡适对“续书”的研究。周汝昌先生恪守“新红学”家法的同时，也有创新与超越，比如他在 1980 年代初就提出要从艺术性的角度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多多致力，稍后，他从文化角度研究《红楼梦》，阐释这部奇书的文化内涵，更是他的新亮点。

与其他《红楼梦》研究人士不同的是，周汝昌先生毕生奉献给“红学”，一生痴迷《红楼梦》、崇拜曹雪芹，直到逝世前数日还不断思考，向家人口述研究提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生“为芹辛苦”。其识见、其创获，是《红楼梦》研究史上难得的宝贵财富。而今，周先生已经魂归道山，我们不能说“新红学”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更不可说“新红学”已走向终结，但有一条可以断言：从此，“新红学”将辉煌不再。

周汝昌先生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走过的是一条历经艰辛、饱受磨难的研究道路；“新红学”走到今天，也已有 90 余年。目前的红学研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实在太需要有人出来开辟《红楼梦》研究的新境界了。而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认真梳理和总结包括周汝昌先生在内的所有先贤的创获与成绩。

2012 年 5 月 31 日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中日战争时期的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活动

胡慧君

编者按：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胡慧君女士对胡适在抗战时期演讲素有研究。胡女士近日将其《中日战争时期的驻美大使胡适的演讲活动》发给本刊，胡文共分四部分：“演讲活动的全貌”、“仅以论文形式刊载的状况”、“胡适演讲活动的分析”、“胡适的演讲内容的关键词”。限于本刊的篇幅，我们在本期先行刊登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部分将在下期的《胡适研究通讯》发表。

前 言

关于中日战争时期胡适在美国的演讲旅程和次数，至今为止的研究，都是以胡适在 1942 年 5 月 17 日给朋友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中所写的「旅行一万六千

英里，演讲百余次」¹为依据来论述的。譬如，对胡适的演讲活动作了详细研究的张忠栋在『胡适五论』（稻乡出版社，2005年6月11日，p.138）中引用了这封信，同时，也提到唐德刚对胡适的「行万里路，演百余讲」的演讲活动，用安徽农民的谚语「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进行批评之事（同 p.112）。莫高义在『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p.186）中，除引用了这封信以外，还引用了「赴全美各地演讲400次之多」的胡适的回想。同时，日本的绪形康在「记忆は抵抗する——驻米大使、胡适の抗日战争——」（『现代中国研究』第12号，中国现代史研究会，2003年3月30日，p.19）中提到「在任大使工作最后的1942年，胡适竟在1万6千公里的旅途里，处理了100余次演讲的过密行程」。可是，这些先行研究都只是根据胡适的言词提及了演讲次数的大概数字，实际上他究竟在什么时候，在哪里，都对谁进行的，作了几次，有证据地，统计性地一个一个进行分析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在此，作者以现在能确认到的资料为基础，试着理清胡适在作为国民使节及驻美大使时的演讲活动的全貌。

一 演讲活动的全貌

以下，把胡适作为国民使节及驻美大使的演讲活动列成 a:时间 b:地点 c:标题 d:对象者 e:出处·根据 f:备考这6个项目，并按日期的顺序进行整理。本论文对「e:出处·根据」使用了略称。即，「日记」指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集』（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年谱五」指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胡先生传」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1941年12月），「西文目录」指季维龙编的『胡适著译系年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所收的「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原出于EUGENE L. DELAFELD·袁同礼编『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3年），「全集」指季羨林主编的『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另，本论文中对「f:备考」用了「关键词①②」等记叙，指的是后述的①～⑧的关键词以及话题。（仅限于在演讲内容中能确认到的部分）。为了计算上的方便，在能确认到的出处·根据等资料的演讲件数前面，附于了连续号码，本论文称此号码为「演讲 No.」。

1). a:1937年9月23日晚饭后8点；b:檀香山的Dillingham Hall；c:不明；d:太平洋学会的有关人员；e:日记，东京朝日新闻昭和20年9月25日号外；f:；

1.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p.1777

- 2). a:1937年9月26日午饭后; b:旧金山大中华戏院; c:中国抗战的意义与将来; d: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e:东京朝日新闻昭和20年9月28日, 日记, 年谱五 p.1616, 「胡先生传」p.103; f:关键词④⑥⑧, 「支那抗战の意义と将来」(『文艺春秋』1938年1月 pp.436-442.);
- 3). a:1937年9月29日午餐会; b:旧金山, Commonwealth Club; c:Can China Win; d:Commonwealth Club 出席者; e:日记, 全集第37卷; f:;
- 4). a:1937年9月30日早餐会; b: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不明; 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5). a:1937年10月1日; b:旧金山 Columbia 广播电台; c: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 in the Present Crisis; d:美国国民; e:日记, 年谱五 p.1617, 全集第44卷 p.123; f:关键词⑥⑦, 后刊载于The Far Eastern Magazine, Vol.1, No.1 November, 1937. pp.14-16. (西文目录171号);
- 6). a:1937年10月18日; b:华盛顿; c:不明; d:四十个工商业, 银行的领袖(如Thomas Lamont); e:日记; f:;
- 7). a:1937年11月3日; b:布鲁塞尔; c:不明; d:「九国公约会议」会议出席者; e:年谱五 p.1620; f:;
- 8). a:1937年11月10日; b:纽约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c:不明; d: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会议出席者; e:西文目录172号, 全集第44卷 p.122; f:西文目录作Address delivered at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New York, N. Y., November 10, 1937. In:China References Series(New York), Vol.2, January 1938. pp.57-60. ;
- 9). a:1937年11月13日; b:纽约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c:远东冲击后面的问题(The Issues Behi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d: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会议出席者; e:年谱五 p.1620; f:关键词①⑤⑥, 后刊载于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38.8 p. (西文目录34号);
- 10). a:1937年12月9日; b:华盛顿的「女记者俱乐部」; c:不明; d:华盛顿的「女记者俱乐部」的记者等; e:「胡先生传」p.103, 年谱五 p.1624; f:关键词⑤⑥;
- 11). a:1937年12月13日; b:纽约阿士打宾馆, 美国「外交政策协会」; c:不明; d:参加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有关远东战事的讨论会」参加者; e:New York Times1937年12月14日; f:关键词⑥⑧, 和胡适对抗的是日本大阪「每日」和「日日」两报的编辑高石真五郎;
- 12). a:1938年1月3日; b:纽约, Professor Mrs.Vladimir Gregorievr Simkhoviich 们设立了的Green House; c:不明; d:Professor Mrs.Vladimir

- Gregorievr Simkhoviich 们; e:日记; f:;
- 13). a:1938年1月4日; b:纽约, Guaranty Trust; c:不明; d:G. T. Co. 的银行家全部 19 人, 其中有一部分人是 Morgan 系列的人; e:日记; f:;
- 14). a:1938年1月10日; b:Cleveland, Hotel Cleveland; c:China's Struggle for Freedom; d: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s 会的 500 人; e:日记; f:;
- 15). a:1938年1月11日十二点; b:Oberlin, Oberlin 的礼拜堂;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16). a:1938年1月11日下午4点半; b:Oberlin; c:The war in China&the Issues Involved; d:不明; e:日记; f:;
- 17). a:1938年1月14日晚7点; b:Washington, D. C. ; c:Education for Peace or War; d:Association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的年会宴会出席者; e:日记; f:;
- 18). a:1938年1月18日晚; b:纽约, Quill Club; c:不明; d:有很多社会上的重要分子, 如 Col. Olive F. Allen, Wm. I. Schieffelin; e:日记; f:;
- 19). a:1938年1月25日6点; b:Ann Arbor, Michigan Union; c:不明; d:Dinner Meeting of the Divis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出席者; e:日记; f:;
- 20). a:1938年1月26日午餐会; b:Ann Arbor, Rotary Club; c:Chinese Youth; d:Rotary Club 有关人员 200 多人; e:日记; f:;
- 21). a:1938年1月26日4点; b:Ann Arbor, Michigan 大学; c:Democracy or Fascism in China?; d:Michigan 大学有关人员; e:日记; f:;
- 22). a:1938年1月26日晚6点; b:Ann Arbor, Michigan 大学; c:美国对远东的政策; d:Michigan 大学中国学生约 160 人; e:日记; f: ;
- 23). a:1938年1月27日; b:Chicago 的 "American Friends of China" 的茶会; c:Can China Survive?; d:茶会出席者; e:日记; f:后刊载于 Forum and Century, Vol. 97, No. 1. January 1937. pp. 39-44 (西文目录 83 号);
- 24). a:1938年1月30日晚餐; b:Chicago, International House; c:Some Permanent Aspec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不明; e:日记; f:;
- 25). a:1938年1月31日; b:Minneapolis; c:不明; d: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的会员; e:日记; f:;
- 26). a:1938年1月31日傍晚5点; b:Minneapolis; c:The Issues Involved in the War; d: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晚餐会出席者 200 多人; e:日记; f:;
- 27). a:1938年2月1日中午时分; b: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不明; d:Professor Harold S. Quigle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教职员, 代理校长, 研究院院长及教授等 20 多人; e:日记; f:;

- 28). a:1938年2月1日3点半; b: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Nationalist China; 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29). a:1938年2月4日; b:Spokane, Eastern Washington College of Education;
c:Conditions in China; d:Eastern Washington College of Education 有关
人员; e:日记; f;;
- 30). a:1938年2月4日午饭后; b:Spokane, Lewis & Clark High School; c:
不明; d:2200个学生; e:日记; f;;
- 31). a:1938年2月4日晚7点50分; b:Spokane, Civic Hall; c:Issues
Involved in the War; d:普通市民1000人; e:日记; f;;
- 32). a:1938年2月5日中午; b:Spokane; c:不明; d:Spokane 商学宗教界的干
部二十数人; e:日记; f;;
- 33). a:1938年2月5日晚; b:Spokane 的广播台; c:不明; d:广播听众; e:日
记; f;;
- 34). a:1938年2月6日晚; b:Spokane, Central Methodist Church; c:不明;
d:到场者1200人; e:日记; f;;
- 35). a:1938年2月7日4点; b:Seattle 的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c:Issues Behind the Far Eastern Conflict; 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36). a:1938年2月8日; b:Bellingham 的 Washington College of Education;
c:不明; d:Washington College of Education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37). a:1938年2月8日夜晚; b:Bellingham 的 Puget Sound Group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晚餐会; c:不明; d:到场者60多人; e:日记;
f;;
- 38). a:1938年2月9日中午; b:Bellingham 的 Sunset Club; c:不明; d:Sunset
Club(一个妇女会)到场者; e:日记; f;;
- 39). a:1938年2月9日; b:Bellingham 的 China Club; c:不明; d:住在美国
的中国人300多人; e:日记; f;;
- 40). a:1938年2月10日11点; b:Bellingham, Faculty Club 的 Research Club;
c:Research work in China; d:到场者都是大学教授; e:日记; f;;
- 41). a:1938年2月10日晚; b:Tacoma 的 Foreign Affairs Forum 的晚餐会; c:
不明; d:Von Brevern, Martin 及 Foreign Affairs Forum 晚餐会的来宾295人,
吃饭后, 又聚集了150人; e:日记; f;;
- 42). a:1938年2月11日; b:Tacoma 的 Moore Theatre; c:不明; d:China Club
主办的 Mass meeting 出席者; e:日记; f;;

- 43). a:1938年2月12日午餐会; b:Portland, Reed College; c:不明; d:Reed College 午餐会的出席者; e:日记; f:;
- 44). a:1938年2月12日晚6点半; b:Portland, University Club, Reed College; c:不明; d:Reed College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45). a:1938年2月16日晚饭后; b:旧金山, Berkeley 的 Wheeler Auditorium; c: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d:700人出席者; e:日记; f:;
- 46). a:1938年2月18日10点; b:Los Angeles, 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不明; d:大学有关人员 2000人; e:日记; f:;
- 47). a:1938年2月18日12点; b:Los Angeles, University Club; c:不明; d:大学有关人员; e:日记; f:;
- 48). a:1938年2月18日4点; b:Los Angeles, Pomona College 的礼堂; c:不明; d:普通市民; e:日记; f:;
- 49). a:1938年2月19日; b:Los Angeles, Pasadena; c:For a Better World Order; d:World Affairs Assembly 大宴会的到场者 600多人; e:日记; f:;
- 50). a:1938年2月20日午餐会; b:Los Angeles; c:不明; d:华侨; e:日记; f:;
- 51). a:1938年2月23日下午1点15分; b:B.C. 的 Victoria 的 The Left Book Club; c:不明; d:The Left Book Club 到场者约 40人; e:日记; f:;
- 52). a:1938年2月23日晚餐后; b:Victoria,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The Issues Behind the War; d: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出席者; e:日记; f:;
- 53). a:1938年2月24日晚8点15分; b:Vancouver, Dean F. 家 C. I. I. A. 会; c:China Today; d:C. I. I. A. 会的到场者 60人; e:日记; f:;
- 54). a:1938年2月27日下午3点; b:Edmont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不明; d: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到场者约 40人; e:日记; f:;
- 55). a:1938年2月27日6点; b:Edmonton, “Purple Lantern”; c:近日国难情景; d:华侨到场者 250人; e:日记; f:;
- 56). a:1938年2月28日晚6点半; b:Saskatoon, C. I. I. A. 晚餐会; c:不明; d:C. I. I. A. 晚餐出席者; e:日记; f:;
- 57). a:1938年3月2日午餐; b:Winnipeg, Manitoba Club; c:不明; d:Richardson(西部最富之人), Cheste, Murray(皆与粮食有关), Winnipeg Tribune 编辑 McTavish 等; e:日记; f:;
- 58). a:1938年3月2日晚; b:Winnipeg, Canadian Institute;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59). a:1938年3月3日中午; b:Winnipeg, Canadian Club; c:不明; d:Canadian Club 午餐会出席者 500 人; e:日记; f:Free Press 刊登了我的讲话。标题为“A Voice From China” ;G.V.Ferguson
- 60). a:1938年3月5日2点5分; b:Hamilton的McMaster University(Bapti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ub;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61). a:1938年3月5日晚; b:Hamilton Club的Canadian Institute;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62). a:1938年3月7日6点前; b:London, Ont.; c:不明; d:C. I. I. A. 晚餐出席者; e:日记; f:;
- 63). a:1938年3月8日晚6点; b:Windsor, C. I. I. A.; c:不明; d:C. I. I. A. 聚餐的出席者; e:日记; f:;
- 64). a:1938年3月9日中午; b:Toronto的Canadian Club; c:不明; d:Canadian Club 会餐的出席者近 500 人; e:日记; f:有广播;
- 65). a:1938年3月10日中午; b:Montreal的Canadian Club;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66). a:1938年3月10日晚7点; b:Montreal的C.I.I.A.晚餐会; c:不明; d:C. I. I. A. 晚餐会出席者约七八十人; e:日记; f:;
- 67). a:1938年3月11日晚7点; b:Ottawa的Ridean Club的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 Affairs的晚餐会; c:不明; d: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 Affairs 晚餐会出席者; e:日记; f:;
- 68). a:1938年3月12日1点; b:Ottawa的Canadian Club; c:不明; d:到场者很多, Prime Minister McKenzie King(总理)也来场。女性议员 Miss McPhail 也以资格出席了会议; e:日记; f:;
- 69). a:1938年3月15日; b:Ithaca, Miss Gaskill的中国史班; c:有关「宋儒」; d:Miss Gaskill的中国史班学生; e:日记; f:;
- 70). a:1938年3月16日午饭后; b:Ithaca, Law School; c:Recent Discoveries of New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 d:Ithaca, Law School 学生; e:日记; f:这次旅程(从1月25日3月16日)全部 51 日, 作 56 次演讲。美国国内 38 次, 加拿大国内 18 次(日记里记有细目)。;
- 美国 (Ann Arbor) 4
(Chicago) 2
(Minneapolis) 5
(Spokane) 7

(Seattle)
(Bellingham) 9
(Tacoma)
(Portland) 2
(S. F.) 1
(Los Angeles) 6
(Ithaca) 2
(计)38
加拿大 (Victoria) 2
(Vancouver) 1
(Edmonton) 2
(Saskatoon) 1
(Winnipeg) 2
(Hamilton) 2
(London) 1
(Windsor) 1
(Toronto) 2
(Montreal) 2
(Ottawa) 2
(计) 18

71). a:1938年3月17日晚; b:Ithaca, 中国学生会; c:不明; d:中国学生; e:日记; f:「这是我此行第57次演说」;

72). a:1938年3月31日晚10点; b:Philadelphia, College Chinese Scholarship Committee 晚餐会; c:不明; d:College Chinese Scholarship Committee 晚餐会出席者; e:日记; f:;

73). a:1938年4月1日晚8点15分; b:Philadelphia, 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 Political Science 年会; c:To Have not and Want to Have; d:American Academy of Social & Political Science 年会出席者; e:日记; f:后刊载于The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98, pp. 59-64. (西文目录88号, 年谱五 p. 1631);

74). a:1938年4月7日晚; b:纽约,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in China 晚餐会; c:不明; d: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in China 晚餐会出席者; e:日记; f:;

75). a:1938年4月23日晚; b: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年会宴会; c:Scientific Method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d: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年会宴会出席者; e:日记; f;;

76 a:1938 年 4 月 28 日; b:纽约, Smith College Club; c:The Chinese Renaissance; d:Smith College Club 出席者; e:日记; f;;

77). a:1938 年 5 月 3 日晚 8 点半; b:Framingham, Wellesley College;
c:China's National Unity; d:学生; e:日记; f;;

78). a:1938 年 5 月 4 日晚饭后; b:纽约, International House; c:五四的故事及其意义; d:不明; e:日记; f;;

79). a:1938 年 5 月 12 日晚 7 点; b:纽约, Shelton Hotel; c:不明; d:协和医校的聚餐到场者 200 人; e:日记; f;;

80). a:1938 年 5 月 13 日晚饭后 8 点; b:Richmond, Ind.,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会场; c: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ino-Jap. Conflict;
d: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出席者; e:日记; f:日本大使馆的参事 Suma 须磨代表日本的立场作了演讲;

81). a:1938 年 5 月 14 日晚; b:Richmond,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会场; c:Issues behind the Conflict; d: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出席者; e:日记; f;;

82). a:1938 年 5 月 16 日 2 点; b:Cincinnati, Univ.Union; c:不明;
d:Univ.Union 的 Vinacke 的外交政策班学生; e:日记; f;;

83). a:1938 年 5 月 26 日晚 11 点 15 分; b:纽约 WOR 广播台; c:不明; d:美国国民; e:日记; f;;

84). a:1938 年 6 月 2 日; b:纽约, Dalton School; c:Values to be Cherished;
d:学生; e:日记; f;;

85). a:1938 年 6 月 4 日; b:纽约, International House 高丽学生年会; c:不明;
d:高丽学生年会有关人员; e:日记; f;;

86). a:1938 年 6 月 24 日下午 8 点; b:纽约, 唐人街; c: 不明; d:土生中国男女青年; e:日记; f;;

87). a:1938 年 6 月 24 日 10 点; b:纽约, Columbia Broadcasting Network;
c:What can America Do in 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d:不明; e:日记; f:
后刊载于 IBID, Vol. 2, No. 6. August 1938. pp. 293-295. Also in:The China weekly Review, Vol. 86. September 24, 1938, pp. 106-107. (西文目录 90 号);

88). a:1938 年 6 月 27 日下午; b:Cape May, N. J., "Friends' General Conference"; c:Force & the World Order; d:听众 1000 人; e:日记; f;;

89). a:1938 年 6 月 28 日; b:Wallingford, Pendle Hill, Pa.; c:不明; d:当

- 地学生 50 人； e:日记； f:；
- 90). a:1938 年 7 月 1 日； b:LaSalle St.Chigaco, 中国基督教学生大会； c:National Crisis & Student Life； d:中国基督教学生大会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630； f:后刊载于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Vol. 29, No. 2. December 1938. pp. 3-4. (西文目录 173 号)；
- 91). a:1938 年 7 月 1 日； b:LaSalle, Chigaco； c:The Far Eastern Situation； d:中国基督教学生大会出席者； e:年谱五, p. 1630； f:后刊载于 IBID, Vol. 29, No. 3, January, 1939. pp. 9-10. (西文目录 174 号)；
- 92). a:1938 年 7 月 5 日下午 4 点半； b:Ann Arbor, Michigan 大学； c: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Classical Schools of Ancient China； d:Michigan 大学有关人员； e:日记； f:；
- 93). a:1938 年 7 月 6 日午餐； b:Ann Arbor, Institute 会餐； c:不明； d:Institute 的会餐出席者； e:日记； f:；
- 94). a:1938 年 7 月 6 日下午； b:Ann Arbor, Institute； c: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dieval China； d:Institute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95). a:1938 年 7 月 6 日下午； b:Ann Arbor, 中国学生会； c:抗日一周年； d:中国学生； e:日记； f:关键词④⑥；
- 96). a:1938 年 7 月 7 日下午； b:Ann Arbor； c:不明； d:Institute 有关人员； e:日记, 「胡先生传」 p. 104, 年谱五, p. 1630； f:；
- 97). a:1938 年 7 月 8 日； b:Ann Arbor； c:不明； d:Institute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98). a:1938 年 7 月 11 日； b:纽约, Port Arthur；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我做了演讲。我在美国九个月, 无他成绩, 只能力行「无为」而已。；
- 99). a:1938 年 8 月 17 日； b:英国伦敦, The New Commonwealth Institute； c:不明； d:The New Commonwealth Institute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100). a:1938 年 8 月 21 日； b:伦敦, China Institute(英国)； c:不明； d:中国学生； e:日记； f:；
- 101). a:1938 年 8 月下旬； b:伦敦「中华协会」； c:「抗战一周年的观感」； d:伦敦「中华协会」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104, 年谱五 pp. 1642-1643； f:；
- 102). a:1938 年 8 月 30 日上午； b:瑞士的史学会； c: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 d:史学会出席者； e:日记； f:；
- 103). a:1938 年 10 月 28 日； b:华盛顿； c:不明； d:新闻记者 24 人； e:日记； f:；
- 104). a:1938 年 11 月 2 日； b:华盛顿； c:不明； d:新闻界； e:「胡先生传」 p. 25, p. 124, 「蒋总统秘录」第 12 册, p. 23, 年谱五 p. 1652； f:；

- 105). a:1938年11月17日晚; b:华盛顿的Orientalia的晚餐会; c:中国近况; d:Orientalia晚餐会50多人; e:日记; f:;
- 106). a:1938年11月26日; b:华盛顿, Cosmos Club; c:为Chamberlain辩护; d:Cosmos Club有关人员; e:日记; f:;
- 107). a:1938年11月28日; b:华盛顿的Overseas Writers Club;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 108). a:1938年12月4日晚餐后; b:纽约的Harmonie Club; c:Japan's war in China; d:纽约的Harmonie Club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654; f:关键词③④⑥⑧, 后刊载于Chinese Cultural Society, 1938, p. 7. (西文目录35号, 年谱五 p. 1661);
- 109). a:1938年12月5日; b:纽约的Lawyer's Club; c:Japan's war in China; d:Lawyer's Club的50人; e:日记, 年谱五 p. 1655; f:关键词③④⑥⑧, 在医院住了七十七天;
- 110). a:1939年5月24日; b:华盛顿, Columbia Alumni Club Banquet; c:我对Columbia Univ.的回忆; d:Columbia Alumni Club Banquet有关人员; e:日记; f:;
- 111). a:1939年5月26日; b:华盛顿; c:不明; d:合众社记者; e:「胡先生传」p. 26, 年谱五 p. 1667; f:关键词④⑥⑧;
- 112). a:1939年5月27日; b:华盛顿; c:不明; d:合众社记者; e:「胡先生传」p. 26, 年谱五 p. 1667; f:关键词⑦;
- 113). a:1939年6月6日; b:纽约, Columbia University Alumni Luncheon; c:不明; d:Columbia University Alumni Luncheon有关人员; e:日记, 1939年6月7日「New York Times」, 年谱五 p. 1669; f:;
- 114). a:1939年6月6日; b: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毕业式; c:不明; d: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e:年谱五 p. 1669; f:后刊载于IBID, Vol. 29, No. 6-7, June, 1939, p. 8(西文目录175号);
- 115). a:1939年6月10日11点; b:Philadelphia, Haverford College; c:Commencement Address at Haverford College; d:Haverford College毕业式参加者; e:日记; f:;
- 116). a:1939年6月17日夜晩; b:Ithaca, 同班(1914年)的年会 Alumni Luncheon; c:不明; d:同班(1914年)的年会出席者2000多人; e:日记; f:;
- 117). a:1939年6月18日中午; b:Ithaca, 中国学生会; c:不明; d:中国学生; e:日记; f:;
- 118). a:1939年6月20日; b:纽约; c:关于「天津事件」; d:美国新闻界; e:

- 「胡先生传」 pp. 26-27, 年谱五 p. 1670; f;;
- 119). a:1939年7月7日; b:美京侨民游行大会; c:不明; d:华侨; e:日记; f;;
- 120). a:1939年7月25日; b:纽约, Greenwich, Conn.; c:不明; d: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in China 到场者 90 人; e:日记; f:我和 Dr. Judd 有演说;
- 121). a:1939年8月10日下午4点; b:Ann Arbor 的 Racklam Hall; c:Let's Look a Little Ahead; d:1000 多人; e:日记, 年谱五 p. 1673, 全集第 37 卷 p. 528; f:关键词①②④⑥⑧;
- 122). a:1939年8月11日下午6点; b:Ann Arbor, 中国学生会; c:不明; d:中国学生 180 人; e:日记; f;;
- 123). a:1939年9月26日下午1点; b:华盛顿, Women's National Press Club; c:不明; d:Women's National Press Club 会员; e:日记; f;;
- 124). a:1939年10月6日; b:Pittsburgh, U. of Pittsburgh; c:Dedication of China Memorial Room; d:China Memorial Room Committee 有关人员; e:日记, 年谱五 p. 1682, 全集第 37 卷 p. 544; f;;
- 125). a:1939年10月9日中午; b:New York; c:不明; d:中国银行等银行界的领导人; e:日记; f;;
- 126). a:1939年10月10日下午; b:New York World's Fair 的 China Day 仪式; c:Broadcast, New York World's Fair (The Meaning of October Tenth); d:China Day 仪式的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682, 全集第 37 卷 p. 549-555; f:后刊载于 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Vol. 30.No. 1-2. October-November, 1939. p. 4. (西文目录 178 号);
- 127). a:1939年10月20日晚; b:New York City, Pennsylvania Hotel; c:不明; d:杜威先生八十岁生日纪念聚餐会的到场者约 700 人; e:日记; f;;
- 128). a:1939年10月22日; b:纽约, Conference on Methods of Philosophy; c:不明; d:Conference on Methods of Philosophy 参加者; e:日记; f;;
- 129). a:1939年10月30日; b:New York, China Society 宴会; c:We are Still Fighting; d:China Society 宴会参加者 300 人; e:日记, 年谱五 p. 1682; f:关键词①⑥⑧, 后刊载于 China Magazine, Vol. 16, No. 1. February, 1940, pp. 4-6. (西文目录 94 号), 又以「战争はまだ続く」为题刊登在日本的杂志『改造』1940年4月号;
- 130). a:1939年10月31日; b:纽约; c:To Friends of China in America; d:「一碗饭运动」集会出席者; e:年谱五 p. 1686; f:关键词⑥⑧, 后刊载于 Bowl of Rice Ball. Program for New York city Bowl of Rice Dinner and Ball, Address

- given October 31. 1939. pp. 5-6. (西文目录 177 号);
- 131). a:1939 年 11 月 1 日晚; b: 美国医药援华协会; c:伟大的同情心; d:美国医药援华协会有关人员; e:全集第 44 卷 p. 158; f:;
- 132). a:1939 年 11 月 11 日; b:纽约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 c:不明; d:美国听众; e:年谱五 p. 1686; f:关键词①⑦, 后刊载于 In:The Family of Nations. Address delivered over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Network. New York, 1939, pp. 14-16(西文目录 176 号);
- 133). a:1939 年 11 月 14 日晚; b:纽约, Syracuse, N. Y. 大学(Syracuse U.); c:不明; d:学生; e:日记; f:;
- 134). a:1939 年 11 月 15 日晚; b:纽约, Syracuse, Philosophy Club; c:不明; d:Philosophy Club 出席者; e:日记; f:;
- 135). a:1939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b: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的 Timothy Dwight College; c:「负责任的思想」(Responsible Thinking); d:Dwight College 的学生; e:日记, 「胡先生传」p. 27, 年谱五 p. 1688; f:;
- 136). a:1939 年 11 月 23 日晚; b:New Haven, Lawn Club; c:不明; d:Lawn Club 集会出席者; e:日记, 「胡先生传」p. 27, 年谱五 p. 1688; f:关键词④⑥⑧;
- 137). a:1939 年 11 月 24 日中午; b:New Haven, 中国学生会; c:不明; d:中国学生; e:日记; f:;
- 138). a:1939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1 点; b:New York 的 Town Hall; c: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d:美国国民; e:日记, 年谱五 p. 1690, 全集第 37 卷 p. 562; f:关键词②④⑤⑥⑧, 后刊载于 China Monthly, Vol. 1. No. 2. January, 1940. pp. 4-5, 12-13.) (西文目录 93 号), 又, 日本的杂志『改造』, 于 1940 年 3 月把胡适的这个演讲翻译成日语以「支那の现情势」为题来刊登;
- 139). a:1939 年 12 月 9 日中午; b: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午餐会; c:不明; d: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的出席者; e:日记, 「胡先生传」p. 106, 年谱五 p. 1696; f:;
- 140). a:1939 年 12 月 11 日中午; b:Cincinnati, Netherland Plaza, 中国救济餐会; c:不明; d:中国救济餐会到场者 925 人; e:日记; f:;
- 141). a:1939 年 12 月 29 日中午; b:华盛顿, 美国历史协会; c:Modernization of China & Japan: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 conflict; d:美国历史协会有关人员; e:日记, 年谱五 p. 1696; f:后刊载于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 No. 4. Supplementary Winter, 1940. pp. 773-780(西文目录 183 号);
- 142). a:1940 年 1 月 8 日; b:纽约, 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

- c:China & the World War; d: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 Sciences 出席者; e:日记, 全集第 37 卷 p. 604; f:;
- 143). a:1940 年 1 月 12 日中午; b:Philadelphi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c:The World War & the Future World Order; d: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的有关人员; e:日记; f:;
- 144). a:1940 年 1 月 25 日; b:New York, “Associated Broads for the China Colleges” 宴会; c:China Christian College and American Friends; d: “Associated Broads for the China Colleges” 宴会到场者 500 多人; e:日记, 年谱五 p. 1703; f:后刊载于 IBID, Vol. 30, No. 4. February-March, 1940. pp. 1, 7-8(西文目录 179 号);
- 145). a:1940 年 1 月 27 日中午; b:纽约, Waldorf-Astoria 的 Cornell Women 的年会; c:不明; d:Waldorf-Astoria 的 Cornell Women 的年会出席者; e:日记; f:;
- 146). a:1940 年 3 月 5 日晚; b:Winter Park, Florida, The Rollins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 The Far East and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World; d:The Rollins Institut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704, 全集第 44 卷 p. 173; f:后刊载于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 , No. 3. Summer, 1940. pp. 399-407(西文目录 180 号);
- 147). a:1940 年 3 月 13 日晚; b:New York; c:Chinese Renaissance; d:Mrs. Murry K. Crane 家的来客; e:日记; f:;
- 148). a:1940 年 3 月 26 日晚; b:Los Angeles; c:不明; d:在孝笃亲公所的被邀请吃饭的客人; e:日记; f:;
- 149). a:1940 年 3 月 27 日; b:Los Angeles, Commonwealth Club; c:China After 33 months Fighting; d:不明; e:日记; f:;
- 150). a:1940 年 3 月 28 日下午; b: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不明; d:中国学生; e:日记; f:;
- 151). a:1940 年 4 月 7 日 11 点; b:New York, Society of Ethical Culture; c:Society Immortality; d:Society of Ethical Culture 的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705; f:后以 A View of Immortality 为题刊载于 An Address at the New York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 April 7, 1940, New York, 1940, pp. 1-4. (西文目录 36 号);
- 152). a:1940 年 4 月 13 日中午; b:Rochester, City Club, N. Y; c:不明; d:City Club 的到场者; e:日记 1; f:;
- 153). a:1940 年 4 月 13 日下午; b:Rochester, N. Y. 的 Salem Church 的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c:New Pacificism; d: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到场者; e:日记; f:;

154). a:1940年5月1日中午; b:华盛顿, Baltimore 的 Engineers Club; c:不明; d:不明; e:日记; f:;

155). a:1940年5月6日; b:华盛顿, Univ. of Chicago Club 的年会; c:不明; d:年会出席者; e:日记; f:;

156). a:1940年5月9日晚; b:New York, Economic Club 年会宴会; c:National Progress and International Anarchy(On General Subject Prosperity and Employment); d:Economic Club 年会宴会出席者; e:日记, 全集第38卷 p. 1; f:;

157). a:1940年6月5日; b:Philadelphia, Bryn Mawr College; c:不明; d:Bryn Mawr College 毕业式参加者; e:日记; f:;

158). a:1940年6月10日; b:Philadelphia, Union College; c:Intellectual Preparedness; d:Union College 毕业式参加者; e:全集第38卷 p. 7; f:;

159). a:1940年9月18日在; b:Philadelphia, Rotary Club; c:Sept. 18, -An anniversary of world anarchy; d:Rotary Club 的餐会出席者; e:日记; f:;

160). a:1940年9月19日; b: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a. ; c:Instrumentalism as a Political Concept; d: Univ. of Penna. 有关人员; e:日记; f:;

161). a:1940年10月24日中午; b:纽约, The Merchant's Association; c:China Fights On; d:The Merchant's Association 出席者; e:日记, 「胡先生传」 p. 107, 年谱五 p. 1710, 全集第38卷 p. 68; f:后刊载于 War and Peace Aim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ited by Louise W. Holburn.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43, Vol. 1, pp. 378-379(西文目录 188 号);

162). a:1940年10月24日下午; b: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c:Saving Democracy in China(China's Part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Saving of Democracy); d: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出席者; e:日记, 「胡先生传」 p. 107, 年谱五 p. 1710, 全集第38卷 p. 78; f:关键词⑦, 后刊载于 America's Second Fight for Freedom, Report of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0th Annual Forum on Current Problems at the Waldorf-Astoria, New York, October 22, 23, 24, 1940, New York, N. Y. 1940, pp. 235-238(西文目录 181 号);

163). a:1940年10月24日; b:纽约的 Vassar 女子学院国际研究会; c:不明; d:Vassar 女子学院国际研究会出席者; e:年谱五 p. 1711; f:;

164). a:1940年10月28日; b:联合大学; c:不明; d:不明; e: 「胡先生传」 p. 107, 年谱五 p. 1712; f:;

- 165). a:1940年10月28日; b:纽约拉库斯城(Syracuse city)的纽约州教育局长协会; c:不明; d:纽约州教育局长协会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p.107, 年谱五 p.1712; f:;
- 166). a:1940年11月1日; b: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及援华医药救济委员会; c:An Address at the Bowl of Rice Dinner; d:美国援华委员会及援华医药救济委员会有关人员; e:年谱五 p.1712, 全集第38卷 p.85; f:;
- 167). a:1940年11月8日; b:马萨诸塞州, Mount Holyoke college&Smith college; c:不明; d:Mount Holyoke college&Smith college 有关人员; e:年谱五 p.1712; f:;
- 168). a:1940年11月14日; b:Boston; c:不明; d:William Allan White Committee for Defending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 e:日记, 年谱五 p.1713; f:;
- 169). a:1940年11月14日; b:Boston的Harvard Club; c:不明; d:East Asiatic Society 餐会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1713; f:;
- 170). a:1940年11月15日中午; b:Boston; c:The Place of the Alumni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Universities; d:Cornell Alumni Association 年会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1713; f:;
- 171). a:1940年11月15日晚; b:Boston, 在Fletcher School of Law&Diplomacy(Medford, Mass.); c:不明; d:Prof. George H.Blakeslee 夫妇等; e:日记, 年谱五 p.1713; f:在Boston的26小时之间, 作了4次演讲。;
- 172). a:1940年11月28日; b:New York 的Town Hall 的广播; c:What Kind of World Order Do We Want?; d:电台广播的听众; e:日记, 「胡先生传」p.108; f:后刊载于Town Meeting, Vol.6, No.3. December 2, 1940. pp.4-7(西文目录182号);
- 173). a:1940年12月5日; b:纽约世界学社; c:Women's Place in Chinese History; d: 纽约世界学社出席者; e:年谱五 p.1713; f:后刊载于1954. p.8. The author's note:" This paper was first read in 1931 before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in Tientsin, China.A Summary of it was read at a meeting of friends of Ginling College for Women sponsord by Mrs.Dwight Morrow, Mrs.Louis F.Slade, Mrs.Theodore Roosevelt, Jr. and others on December 5, 1940 at the Cosmopolitan Club in New York City "(西文目录43号);
- 174). a:1941年1月11日晚; b:纽约Cornell Club 的Foundation Day; c:Ezra Cornell; d: 纽约Cornell Club 的Foundation Day 出席者; e:日记; f:;

- 175). a:1941年1月16日下午4点; b:New Haven, Yale 大学的 Art Gallery 礼堂; c:A Historian Looks at Chinese Painting; d:Yale 大学有关人员; e:日记, 年谱五 p. 1719; f:后刊载于 Asia Magazine ,Vol. 41, No. 5 (Mah 1941), pp. 215-218 (西文目录 100 号);
- 176). a:1941年1月17日下午; b:Hartford Seminary 茶会; c:不明; d:Hartford Seminary 茶会出席者 100 多人; e:日记; f:;
- 177). a:1941年1月23日; b:纽约, China Society 宴会; c:**An Address Before the China Society of America**; d:China Society 宴会出席者; e:日记, 全集第38卷 p. 131; f:;
- 178). a:1941年1月27日; b:纽约的 Bronxville, N.Y. Little Forum 宴会; c:不明; d:当地的 Little Forum 宴会参加者; e:日记; f:;
- 179). a:1941年2月5日; b:New York City; c:Ambassador's Remarks, William Allen White Dinner; d: William Allen White Dinner 出席者; e:全集第38卷 p. 173; f:;
- 180). a:1941年2月24日; b:纽约的 Amherst; c:China's Fight for Freedom; d:Political Union (of Amherst College) 的有关人员; e:日记, 全集第38卷 p. 139; f:;
- 181). a:1941年2月6日; b:纽约, the Union League Club; c:Conditions in China and the Outlook; d:the Union League Club 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29, 年谱五 p. 1716; f:关键词④⑥;
- 182). a:1941年2月15日; b:Washington, D.C., The Literary Society; c:The Chinese Novel; d:The Literary Society 有关人员; e:全集第38卷 p. 150; f:;
- 183). a:1941年2月25日; b:纽约, The Churchman Dinner in honor of Mr. Wm. Allen White; c:不明; d:The Churchman Dinner in honor of Mr. Wm. Allen White 出席者; e:日记; f:;
- 184). a:1941年2月27日早上; b:华盛顿的 Atlanic City, Atlanic City, 71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c:A New World Order Cometh; d:Atlanic City, 71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 出席者; e:日记; f:;
- 185). a:1941年3月12日; b:Illinois, Univ. of Illinois; c: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d:Univ. of Illinois 有关人员; e:全集第38卷 p. 181; f:;
- 186). a:1941年4月2日; b:华盛顿的 Shorcham Hotel, 美国首都的妇女会; c:Far East Lecture Series; d:美国首都的妇女会一千人; e:日记; f:;

- 187). a:1941年4月7日; b:纽约, 纽约伦理文化协会; c:「社会永生」; d:纽约伦理文化协会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109, 年谱五 p. 1718; f:;
- 188). a:1941年4月10日; b:Boston, 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 c:「十七世纪中国哲学的叛徒」; d: 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109, 年谱五 p. 1718; f:;
- 189). a:1941年4月13日; b:华盛顿的罗斯福特城俱乐部; c:不明; d:罗斯福特城俱乐部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109, 年谱五 p. 1718; f:;
- 190). a:1941年4月30日; b:华盛顿的世界博览会展示会场开幕式; c:Dedication Ceremonies for the Bureau Pavilion at the World's Fair; d:世界博览会展示会场开幕式出席者; e:年谱五 p. 1718; f:后刊载于 ABMAC Bulletin, Vol. 3, No. 4. April, 1941. p. 4(西文目录 184 号);
- 191). a:1941年6月16日; b:Middlebury College, Vt. 毕业式; c:不明; d:Middlebury College, Vt. 毕业式参加者; e:日记; f:;
- 192). a:1941年6月; b:Purdue University 毕业式; c:「知识的准备」(Intellectual Preparedness); d:Purdue University 毕业式参加者; e:年谱五 p. 1721; f:后刊载于 Lay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1941, pp. 20-28(西文目录 37 号);
- 193). a:1941年7月1日; b:华盛顿; c:关于轴心国承认「汪伪组织」一事; d:不明; e:「胡先生传」 p. 29, 年谱五 p. 1729; f:;
- 194). a:1941年7月8日下午; b:Ann Arbor, Hill Auditorium; c: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d:Hill Auditorium 有关人员, 听众约 2,3 千人; e:日记, 年谱五 p. 1730; f:关键词⑤⑧, 后刊载于 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 The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8. November, 1941, pp. 26-36(「西文著作目录」103号, 全集第44卷 p. 197);
- 195). a:1941年7月9日上午; b:Ann Arbor; c:American & The Far East; d:不明; e:日记; f:;
- 196). a:1941年7月22日; b:Harvard Summer School, Boston; c:Seeking a Plan and a Philosophy for a New World Order; d:Harvard Summer School 有关人员; e:全集第38卷 p. 249; f:;
- 197). a:1941年9月19日; b:Cincinnati the Fifty-second Annual Co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fe Underwriters; c:China's Fight for Freedom; d:the Fifty-second Annual Co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fe Underwriters; e:全集第38卷 p. 274; f:;
- 198). a:1941年9月24日; b:Univ. of Chicago; c: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the Occident and the Orient; d:Univ. of Chicago 有关人员; e:全集第 38 卷 p. 290; f:;

199). a:1941 年 10 月 2 日; b:纽约, 麦迪生广场花园, 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所; c:Speech at the United China Relief Rally; d:在美国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所主办的「中国广播大会」, 做了演说。参加者有, New Jersey 州长 J. Edison, 联邦保安部部长, 纽约市长, 名作家等以及市民 18000 人; e:「胡先生传」 p. 30, 年谱五 p. 1742, 全集第 38 卷 p. 321; f:;

200). a:1941 年 10 月 10 日; b:纽约的 the Columbia Broadcasting Station; c:Soul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 38 卷 p. 324. p. 330; f:后刊载于 Sphere(Monthly from Washington), Vol. 28, No. 5(November, 1941), pp. 9-10, 35(西文目录 105 号);

201). a:1941 年 10 月 10 日; b:纽约的 the Mutual Broadcasting System; c:China's Gre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Thirty Years under the Republic;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 38 卷 p. 336; f:;

202). a:1941 年 10 月 23 日; b:Pittsburgh, the Occasion of Founder's Day; c: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Founder's Day; d:on the Occasion of Founder's Day 参加者; e:全集第 38 卷 p. 342; f:;

203). a:1941 年 10 月; b:New Jersey 州的两院联合会; c:不明; d:New Jersey 州的两院联合会参加者; e:「胡适言论集」乙编 p. 36, 年谱五 p. 1742; f:这是先生受到外国立法机关招待的第一次;

204). a, 1941 年 11 月 10 日; b: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New York city; c:Confucius; d:the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有关人员; e:全集第 38 卷 p. 375; f:;

205). a:1941 年 11 月 13 日; b:New Orleans, Louisiana; c: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 d:The sigma Delta Chi Convention 出席者; e:全集第 38 卷 p. 394; f:;

206). a:1941 年 11 月 15 日; b:New Orleans 的 Tulane University; c:不明; d:Tulane University 有关人员; e:「胡先生传」 p. 30, 年谱五 p. 1743; f:关键词④⑥;

207). a:1941 年 12 月 7 日(美国时间为 6 日); b:纽约, 由纽约的重要人物为他主办的盛大宴会; c:不明; d:由纽约的重要人物为他主办的盛大宴会的出席者; e:年谱五 p. 1747; f:;

208). a:1941 年 12 月 15 日; b:the Canadian Club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 c:China's Power to Fight on; d:the Canadian Club of Toronto 参加者; e:全集第 38 卷 p. 400; f:;
- 209). a:1941 年 12 月 19 日; b:华盛顿的美国中国协会所主办的欢迎中国大使的宴会; c:Our Honorable Enemy; d:美国中国协会所主办的欢迎中国大使的宴会出席者; e:年谱五 p. 1751; f:后刊载于 China at War, Vol. 8, No. 1, January, 1942(西文目录 187 号);
- 210). a:1941 年 12 月末; b:美国政治学会年会; c:不明; d:美国政治学会年会出席者; e:「胡适时论」1 集 p. 48, 年谱五 p. 1752; f:;
- 211). a:1942 年 1 月 10 日晚; b: 纽约, at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Commission; c:The Odyssey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d:American Educational Policies Commission 会餐参加者; e:日记, 全集第 38 卷 p. 417; f:;
- 212). a:1942 年 1 月 17 日; b:Philadelphia, Real Estate Board 年会; c:不明; d:Real Estate Board 年会出席者; e:日记, 年谱五 p. 1755; f:后刊载于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77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D. C., January 17, 1942, pp. 1-2. (西文目录 187 号);
- 213). a:1942 年 1 月 19 日中午; b:Detroit 的 Economic Club 的年会; c:Introducing China-Old Friend and New Ally ; d:Economic Club 的年会参加者; e:日记, 全集第 38 卷 p. 420; f:;
- 214). a:1942 年 1 月 20 日中午; b:Minneapolis, Minn., Civic&Commerce Association; c:不明; d:Civic&Commerce Association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215). a:1942 年 1 月 20 日下午; b:Minneapolis, Minn. Nankin 饭馆; c:不明; d:中国人学生 30 数人; e:日记; f:;
- 216). a:1942 年 1 月 20 日晚; b:Minneapolis, Minn. 的 United China Relief Committe 的宴会; c:不明; d:United China Relief Committe 的宴会出席者; e:日记; f:;
- 217). a:1942 年 1 月 22 日; b:纽约; c:「桥」(Bridge); d:不明; e:日记; f:;
- 218). a:1942 年 1 月 22 日晚; b:纽约的 Harvard Club; c:不明; d:Harvard Club 有关人员; e:日记; f:;
- 219). a:1942 年 2 月 14 日; b:Antioch College, Yellow Springs, Ohio; c:A Philosophy of Life; d:Antioch College 有关人员; e:全集第 38 卷 p. 466; f:;
- 220). a:1942 年 2 月 19 日; b:the West Coast, Seattle, San Francisco; c:China As a Fighting Ally(中国为一个作战的盟邦); d:不明; e:年谱五 p. 1759, 全集第 38 卷 p. 477; f:关键词①③④⑤⑥⑧;
- 221). a:1942 年 2 月 20 日; b:Vancouver, B. C., 2nd Victory Loan Campaign;

c:Canada and China as Comrades in War; d:2nd Victory Loan Campaign 出席者; e:全集第 38 卷 p. 491; f:;

222). a:1942 年 3 月 11 日; b:at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dinner at East Orange, New Jersey; c:China's Fighting Strength and Fighting Faith; d:the Chamber of Commerce dinner 出席者; e:全集第 38 卷 p. 502; f:;

223). a:1942 年 3 月 14 日; b:广播电台 ; c:Remarks at East-West Association Dinner for India;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 38 卷 p. 508; f:;

224). a:1942 年 3 月 16 日; b: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c:Spee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d: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出席者; e:全集第 38 卷 p. 512; f:;

225). a:1942 年 3 月 16 日; b: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战争救济会; c:This is A Tiny Cloud; d: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战争救济会参加者; e:年谱 五 p. 1767; f:后刊载于 Time Magazine, Vol. 39, No. 11, March 16, 1942, p. 32(西文目录 224 号);

226). a:1942 年 3 月 22 日; b:广播电台 Washington, D. C. ; c:Broadcast over Mutual Network;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 38 卷 p. 528; f:;

227). a:1942 年 3 月 23 日; b:华盛顿(The Radcliffe Club); c:China, too, Is Fighting to Defend a Way of Life; d:不明; e:年谱五 p. 1767; f:关键词 ①⑤⑥⑧, 后刊载于 San Francisco The Grabbon Press, 1942 p. 17(西文目录 39 号);

228). a:1942 年 3 月 27 日; b:Annual Dinner, Columbia Law Review, New York; c:Law and Lawyers in Historic China; d:Annual Dinner, Columbia Law Review 出席者; e:全集第 38 卷 p. 557; f:;

229). a:1942 年 4 月 11 日; b:广播电台 ; c:Broadcast for Opening of United China Relief Campaign; d:在美国的中国人; e:全集第 38 卷 p. 571; f:;

230). a:1942 年 4 月 20 日; b: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China's Place in the Present World Struggle; d:the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Commer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学生; e:全集第 38 卷 p. 573; f:;

231). a:1942 年 5 月 4 日; b:华盛顿的广播电台; c:纪念「五四」; d:中国国内; e:全集第 44 卷 p. 204; f:;

232). a:1942 年 5 月 12 日; b:the Cosmos Club, Washington D. C. ; c:The Struggle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in Historic China; d:Cosmos Club 有关人员; e:全集第 38 卷 p. 603; f:;

233). a:1942 年 6 月 14 日; b:Boston; c: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Rally in Boston;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 38 卷 p. 611; f:;

- 234). a:1942年6月15日; b:Wellesley 女子学院; c:Commencement Address at Wellesley College(Looking Forward); d:Wellesley 女子学院毕业式参加者; e:年谱五 p. 1778, 全集第38卷 p. 614·617; f:后刊载于 IBID, 1943, Vol. 1, pp. 396-397. (西文目录 190 号);
- 235). a:1942年7月7日; b:华盛顿; c:「抗战五周年纪念」; d:中国国内; e:年谱五 p. 1778; f:关键词①④⑤⑥⑧, 应美国宣传部的邀请, 在美京向国内广播「抗战5周年纪念」;
- 236). a:1942年8月8日; b:Washington, D.C. 广播电台; c:Extracts of the Remarks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Dr. Hu Shih; d:美国国民; e:全集第38卷 p. 626; f:;
- 237). a:1942年9月2日开始5日; b:华盛顿大学; c:The United Nations; d:华盛顿大学召开的国际学生大会参加者; e:年谱五 p. 1783; f:后刊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mbly, held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2-5, 1942. New York, 1944., pp. 139-143(西文目录 191 号);
- 238). a:1942年9月5日; b: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mbly, Departmental Auditorium, Washington, D. C.; c:Why, What and How?; d: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mbly; e:全集第38卷 p. 634; f:;

(胡慧君: 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

消息

“胡适文物图片展”在北大图书馆展出

邹新明

2012年6月18日，由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胡适文物图片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展出。

上午十时，开展仪式举行，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安来顺、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高倬贤、北京大学教师代表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哲学系胡军教授，以及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代表等出席。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安来顺副馆长首先致辞，他强调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文史哲等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在推动教育改革，振兴高等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安副馆长还介绍了本次展览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海内外收藏的特色，并指出本次展览是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北京大学的首次合作，纪念馆现在的馆舍就是当年著名的北大红楼，希望双方今后能够进一步加强合作，增进友谊。

刘伟副校长代表北京大学致辞，他回顾了胡适对北京大学的卓越贡献，肯定了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希望展览能够激励北大学子发扬北大学术传统，担负起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任。

哲学系胡军教授从五十公里外的住所专程赶来参加仪式，他在发言中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很多图片都是他以前没有见到的。

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伟副校长、安来顺副馆长、朱强馆长、高倬贤书记为本次展览剪彩。

2011年12月，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曾在该馆举办“胡适文物图片展”，反响很大，本次展览是继此之后国内较大规模的有关胡适的再度展览，展览汇集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社科院近代史所、台北胡适纪念馆等胡适藏书、档案及相关资料收藏重镇的珍贵藏品，展出原件及复制品近120件，包括手稿、书信、书刊、照片、证书、条幅、剪报、文具等。展览分为早年求学、文学革命、学界领袖、学者大使、北大校长、晚年岁月和亲情友情七部分，概括介绍了胡适的生平和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以及与近现代名人的交往。

本次“胡适文物图片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很多图片文物难得一见，加之举办方的精心策划设计，因此一开展即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置身展览之中，参观者对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近现代学术大师、文化泰斗的梦想追求、学术理念、政治主张、人生情趣等留下了全面深刻的印象，因时间流逝而有些模糊的胡适之先生的形象又变得熟悉亲切起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